

2020 年第 6 期总第 38 期

财经参考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图书馆主办



财经参考

2020 年第 6 期·总第 38 期

国际财经

全球数字贸易政策：国别特征、立场分野与发展趋势.....	1
2020 诺贝尔经济学奖：大疫之世的半副药方.....	9
美财政刺激谈判搁浅对经济与大选的影响.....	11
新冠疫情中的金融市场：交易与情绪的博弈.....	12
IMF：新冠疫情将对生活水平造成“持久损害”	14

国内财经

经济内外循环形成的历史、现状和政策转向.....	16
这是我国“十四五”期间及以后的重要任务.....	27
中国“双循环”的六大支柱.....	30

新闻快讯

2020 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拍卖理论”经济学家.....	32
9 月财新中国服务业 PMI 升至 54.8.....	34
IMF 预测：中国将是主要经济体中今年唯一正增长国家.....	35
各方利好点亮黄金周中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35

财经参考

国际财经

全球数字贸易政策： 国别特征、立场分野与发展趋势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2020-10-09)

作者： 余振(武汉大学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随着数字技术的迭代升级，数字贸易的形式不断发生改变，从最初信息技术产品的实体贸易，到以跨境电商平台为媒介的线上贸易，再到以云服务为实现方式的国际远程服务，数字贸易俨然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中不可忽视的新动力。然而，世界主要经济体数字贸易发展水平不同，其数字贸易政策也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差异既是阻碍数字贸易全球多边规则形成的主要障碍，也是未来谋求全球数字贸易合作的现实基础。因此，有必要对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数字贸易政策进行比较，总结各国数字贸易政策的异同点，由此判断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发展趋势。

一、全球数字贸易政策的国别特征

根据各国有关数字贸易的法律和政策性文件，可以将数字贸易规则分为四类。第一，数据监管类政策，主要是对数据使用的管理，包括数据隐私保护、跨境数据流动、计算机本地化等。第二，网络平台管理政策，主要为了规范网络运营商的中介服务，包括网络内容许可和访问、互联网平台（ISP）中介责任、知识产权保护等。第三，产品和服务贸易政策，指对线上交易的产品和服务，以及数字技术产品的管理，包括线上销售管理、税收和补贴、政府采购、技术标准等。第四，数字企业的本地进入政策，包括投资、市场竞争等。全球主要数字经济体包括美国、日本、欧盟以及韩国等发达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在全球数字经济中占据了较大比重，其数字贸易政策对未来全球政策的走向产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此外放眼未来，俄罗斯以及印尼等发展中经济体的数字贸易政策也值得关注。

1. 美国

美国是全球数字贸易最为活跃的国家之一，其数字贸易政策典型特征可以概括为“监管松、准入严”。首先从数据监管来看，美国政策相对宽松。例如美国没有数据隐私管理的全国性法律，只有一些州立法规定“未经授权的人在披露加密个人信息前应当通知州检察长”。近年来，美国才开始加强消费者隐私保护，2018年加利福尼亚州颁布《消费者隐私法》，要求企业有义务向消费者披露其收集、出售或披露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资料，对企业提出了更多通知、披露义务，并针对数据泄露规定了法定损害赔偿金，是美国州层面最严格的隐私立法。其次来看网络平台管理，美国对数字服务中间商的责任要求较为宽松，存在《ISP安全港条例》，授予ISP中介平台免责条件和反通知权利。美国国内对于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责任的界定相对完善，要求“第三方利用平台服务在合法平台上创建和分享非法信息，平台方不对非知识产权的侵权损害承担责任”。网络中介机构如发生侵权行为，只要实施侵权

通知和撤除制度，就不承担侵权责任。再看数字产品和服务贸易政策，美国对信息通信技术产品贸易设置了较多的贸易管制。例如，美国对使用加密方式的商业通信卫星和技术存在出口管制，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或提供服务。尽管美国基本没有设立数字产品进口的歧视性技术标准，但是数字产品的政府采购壁垒较高，并对某些国家存在明显的歧视性。最后再看数字企业的本地进入政策，美国实行了比较严格的限制政策。例如，美国设立外国投资委员会对 FDI 进行经济安全审查，审查点包括：对国内生产的影响；对国内工业的国防能力的影响；对美国关键技术、基础设施的国际领先地位的影响。

2. 日本

日本也是全球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最高的经济体之一，其数字贸易政策与美国较为类似，但是在产品和服务贸易政策方面跟美国略有差异。首先，在数据监管方面，日本的管制水平普遍较低，没有繁琐的跨境数据传输限制，其政策重点主要在于对数据安全的管理。例如日本对金融行业的数据安全管理较为严格，要求公司必须设立专门的数据保护部门。日本允许合法合理的数据跨境传输，但是要求数据传输的第三方提供数据主体的许可签名。其次，在网络平台管理方面，日本没有在网络中介责任和网络内容审查上设置特殊的政策要求，而是重点强调了知识产权保护。自 2013 年以来，日本建立了“日本知识产权桥”的主权专利基金，这一基金由日本几家网络公司出资创建，旨在防止海外实体对日本企业知识产权的侵犯。再次，在数字产品和服务贸易领域，日本实施了自由化程度较高的政策。例如日本对线上销售的最低免征关税额为 90 美元，允许电子签名；日本的数字产品零关税覆盖率为 99.38%。最后，关于数字企业的本地进入政策，日本没有明确限制电信或信息通信技术的投资，仅设定了直接投资的提前通知要求。但是日本对媒体领域的外商投资要求比较严格，将外国对广播公司的投资份额限制在 20%~33%。

3. 欧盟

尽管欧盟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与美日接近，但是其数字贸易政策却表现出较大的独特性，在数据监管和网络平台管理方面较之美日有较大区别。首先，来看数据监管，欧盟一直以来相当重视数据隐私保护，旨在确保数据安全的情况下推进跨境数据流动，为欧洲数字企业提供更广阔的数据市场。其中，法国和德国的数据监管政策最为严格。目前，欧盟出台了許多数据管理和隐私保护的律，包括《电子私隐指示》(2002/58/EC)、《611/2013 监管条例》、《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等。其次，从网络平台管理来看，欧盟的知识产权保护较为严格，有关法律法规包括 2001 年《版权指令》《欧盟专利制度》，目前关于欧盟使用专利制度的竞争政策和其他补救措施有很多案例。再次，在数字产品和服务贸易政策等方面，欧盟总体上自由化程度较高，例如欧盟仅对双重用途的产品出口实行限制政策，包括计算机、电信和信息安全等，对进口产品没有特殊限制。最后，数字企业的本地进入政策方面，法国和德国的投资壁垒较高。例如，法国存在歧视性反收购规定，允许法国公司对不适用互惠条例的外国公司采取反收购措施，包括授予现有股东通过股票购买认股权证购买折现股份来增加杠杆的权利。此外，法国和德国的几家电信运营商为终止来自欧盟以外的国际业务而对其收取高于其他贸易企业的费用。

4. 韩国

在新兴经济体中，韩国的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发展程度也比较高，其数字贸易政策值得关注。首先来看数据监管，韩国的相关政策比较严格。例如韩国于 2015 年颁布《促进云计算和用户保护促进条例》《云服务保护指导条例》，要求所有为公共机构提供服务的云服务商都必须在国内建立公共数据中心，且必须与服务公众的网络在物理上进行分离。并且韩国实行了《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公司在导出个人数据之前必须征得数据当事人的同意。其次来看网络平台管理，韩国对网络中介也提出了较多的监管要求，包括内容、信息管理等，例如韩国就对网络中介平台提出了较多的责任制度。2015 年 3 月，韩国国会通过了《云计算发展与用户保护法案》，对云服务提供商(CSP)规定了包括向其客户

和部长报告信息泄露、不得向第三方提供客户信息或将其用于指定用途以外的其他目的等义务。再看数字产品和服务贸易政策，韩国的管制也比较严格。韩国数字产品零关税覆盖率较低，仅为43.21%，对外国供应商的电子产品单独设立了10%的增值税。此外，韩国技术标准较高，要求必须对政府采购品进行额外的安全验证，电脑、电气和无线电设备需添加韩国EK认证标记。最后再看数字企业的本地进入政策，韩国没有建立投资筛选机制，但如果有明确证据表明外国投资对经济体安全或公共利益构成威胁，政府有权拒绝外国投资。韩国不允许外国卫星服务企业进入韩国境内，并禁止这类企业直接向最终用户出售服务。此外，韩国对新闻媒体类互联网运营商和信号传输网络运营商的外国投资设定了20%的投资上限。

5. 俄罗斯

较之美日欧等经济体，俄罗斯的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发展水平不高，但是其数字贸易政策有一定的代表性。首先来看数据监管，俄罗斯是数据监管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俄罗斯设立了严格的数据管理要求，要求电信和互联网供应商至少保留数据12个小时，以便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提供数据资料。此外，俄罗斯存在数据本地化规定，要求俄罗斯公民数据的记录、系统化、积累、储存、修改和检索均要使用位于境内的数据库。俄罗斯数据隐私管理较为严格，将“被遗忘权”写入《公民隐私权保护条例》，拓宽隐私权的覆盖范围，相对于欧洲其他国家更为严格。其次来看网络平台管理，俄罗斯设立了严格的网络内容准入要求。实施包括深度检查和监视系统等在内的在线过滤系统。此外，俄罗斯还设立了严格的ISP中介责任制，规定了中介责任不到位的惩罚措施，明确了对侵权行为处理时间的要求。再看数字产品和服务贸易政策，俄罗斯的管制水平也比较高。例如俄罗斯数字产品的零关税覆盖率为62.25%，对销售数字产品的外国企业征收18%的增值税。其没有遵循国际公认的技术认定标准，而是单独制定了俄罗斯适用的通信标准。最后再看数字企业的本地进入政策，俄罗斯的限制壁垒较高。例如，俄罗斯对电信、媒体企业的外商投资设限较高。电信服务只能通过许可证制度提供；用户超过50%的视听服务企业，只允许非俄罗斯公民最多持有20%股权；媒体企业的外国所有权不得超过20%。此外，俄罗斯重点关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外商投资，涉及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的外国控股者不能获得超过50%的投票权，外国投资者必须向联邦反垄断局通报任何在经济体战略实体中获得5%或以上股份的交易。

6. 印度尼西亚

作为发展中国家，印度尼西亚的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发展水平较低，其数字贸易政策却具有发展中经济体的一般特性。首先来看数据监管，印尼有着严格的数据本地化措施。印尼要求公共服务电子系统经营者必须在境内设立数据中心，互联网提供商必须使用本地IP号码并在境内存储数据。印尼没有禁止数据跨境流动，但个人数据的跨境传输必须征得数据主体的书面同意。其次来看网络平台管理，印尼存在网络内容许可和准入限制。印尼要求必须采用DNS、Nawala和信任定位的系统进行网络内容过滤，但没有明确ISP在版权侵权行为方面的作用和责任。再看数字产品和服务贸易政策，印尼对数字产品的进口审查较为严格。印尼禁止酒精产品、加密货币的在线销售，存在域名注册要求。并且线上销售的最低关税免征额为100美元，数字产品零关税覆盖率为33.7%。此外，印尼存在本地化内容限制，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提供商的网络机顶盒应包含至少20%的本地内容，IPTV运营商应在其广播服务中提供至少10%的国内内容，4G智能手机至少拥有30%的本地部件，用于无线宽带的设备应包括至少40%的本地内容。最后再看数字企业的本地进入政策，印尼的监管壁垒较高。印尼不允许外国投资者拥有基站或蜂窝塔，外国投资者必须向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登记并取得许可证。此外，印尼对政府控股公司的外国投资份额设定49%的上限，有限责任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只能为印度尼西亚公民，提供IPTV的任何财团必须由至少两个印尼实体企业组成。

二、全球数字贸易政策的立场分野

在梳理世界主要国家的数字贸易政策的基础上,有必要从数字监管政策、网络平台管理政策、数字产品和服务贸易政策以及企业本地进入政策等层面进行横向比较,从而判断这些国家数字贸易政策的异同点。

1. 数字监管政策比较

数据监管政策是数字贸易监管的核心问题,也是全球贸易治理的新兴领域,各国政策之间的争议也比较突出。第一,在数据隐私保护方面,欧盟国家的隐私保护制度最为全面且严格,其他国家的保护力度皆不如欧盟,但是均逐步加强了隐私保护的措施。其中,美国近些年跟随欧盟的脚步,逐步对国内的隐私保护制度进行完善,但始终没有全国性的统一的个人数据保护法。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是当前全球最严苛的个人数据保护制度,实施这一制度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保护人权,2013年“棱镜计划”被曝光,紧接着,2015年的“斯诺登事件”发酵,欧盟国家自此大大提高了欧洲公民的数据保护力度,并增加了对美国企业的戒备。另一方面,这也是出自经济利益的考虑。欧盟在数字经济领域的企业竞争力显著落后于美国,但是却存在庞大的消费市场以及完备发达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因此,欧盟实施严格的数据保护法,并不会遭遇来自本国企业界利益集团的强力反对,却可以增强其同外国互联网巨头的博弈筹码。第二,在跨境数据流动方面,只有美国采取了高度自由化的政策,强调无障碍、宽领域的国际数据流动,并将金融部门包括在内。这与其他国家形成明显差异,不仅俄罗斯、印尼等发展中国家对跨境数据流动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欧盟、日本、韩国等发达经济体也均强调必须在充分保护个人隐私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国际数据交换。对于金融、医疗等服务部门,多数国家采取禁止数据流动的措施。这一差异的原因在于美国本身拥有能带来巨额经济效益的大型数据流动企业、社交网络服务、网络搜索引擎和其他服务的大公司如脸书和谷歌,这些公司的国际扩张依赖于广泛的数据资源,因此,美国会坚持国际数据自由流动来满足国内实体的需要。而其他国家的数字企业并没有美国企业的全球优势地位,故其利益驱动力相对较弱。第三,在计算机本地化设施方面,美日、欧等国没有明确的本地化要求,而俄罗斯、印尼等国规定了设备本地化或数据本地化的要求,强制要求没有特殊情况,国内产生的数据必须保留在本国境内。一般而言,本地化规定要求外国服务商必须适用本地设备或者将数据储存在本地服务器上,这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不仅意味着要放弃本土设备而采用其他国家的设备,而且无法统一全球服务器的互联互通,这将使企业增加额外的运营成本和管理难度,因此发达国家往往反对本地化要求。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强制本地化实际上是一种国家安全保护政策,一方面能够方便司法机构对公共数据实现及时有效的监管和审查,另一方面鼓励外资使用本国设备,可以促进本国数字存储产业以及云计算的发展。

2. 网络平台管理政策比较

关于网络平台管理的政策大致可分为两类国家,一类以自由的网络环境、健全的知识产权体系为特征,主要以美日欧为代表;另一类以限制网络访问、缺乏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为特征,这类国家以俄罗斯等为代表。第一,在网络内容许可和访问方面,美国等发达国家倡导自由开放的网络访问空间,以确保公民的自由选择权。但是,俄罗斯等国却设置了网络关键词过滤系统,以保护国家信息安全。第二,在互联网中介责任方面,美国、日本等国均存在ISP“安全港”制度,即不增加对互联网中介平台的额外的知识产权保护责任,减轻了运营平台的成本负担。较之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信息保护的技术起步较晚,防范网络信息泄露以及用户受到攻击的能力还有待提升,故为了确保用户信息不被非法收集处理和利用,防止用户系统被非法干扰和控制,这类国家往往实施多种网络内容的审查措施,加强对网络不良内容传播的管控。第三,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美国、日本、韩国、欧盟等国家或经济体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力度具有较强的一致性,这类国家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建立较早,并且其国内数字技术均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建立高标准的产权制度也是为了保持其先进技术的至高位置。而印尼、俄罗斯等国仍处于不断完善国内立法和加强执法的阶段,一方面,这类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起步较晚,其具体的制度内容、执法效率、协调沟通渠道等方面均需完善;另一方面,这些国家仍

需要通过学习与模仿的途径来实现技术进步,适度宽松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更符合其长期发展需要。尽管在现阶段,两类国家的知识产权体系参差不齐,但长期来看,各国都是朝着更加严密和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的方向发展。

3. 数字产品和服务贸易政策比较

数字产品和服务贸易涉及对具体产品和服务等贸易对象的监管,近年来,各国的税收壁垒普遍有所下降,但是对技术产品的安全审查壁垒仍广泛存在。第一,随着《信息技术协定》(ITA)逐渐被WTO国家所履行,数字产品的零关税范围不断扩大,美国和日本的零关税范围较高,但是,其他国家零关税覆盖率相对较低,欧盟部分国家还建立了国外数字产品税收制度。整体来看,跨境电子商务自由化成为主要趋势。第二,多数国家均存在对进出口技术产品的安全审查要求,但是缺乏统一的国际审查标准,各国标准参差不齐。例如日本、韩国等建立了仅适用于本国的技术认证制度,这造成技术安全审查的可操作空间较大。第三,各国均限制国外产品在公共政府部门的使用,除美国、日本以外,大多数国家均存在“文化例外”和“视听例外”的特点,即限制外国新闻、影视、广播等媒体产品在国内的传播。

4. 企业本地进入政策比较

企业本地进入的壁垒在各国均有所体现,其相同点在于均对可能影响国家公共部门利益或者经济安全的投资采取限制措施,例如技术安全性审查、所有权限制等。其不同点在于各国的投资审查力度和侧重点存在差异。美国外资审查的重点在于是否影响到其关键技术或基础设施的国际领先地位,但是缺少公开透明的审查标准。欧盟国家的外商投资限制主要考虑对本土数字企业利益的影响,欧盟国家本身拥有发达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核心技术,其本土企业存在较大优势,但目前欧盟市场却大多被美国企业所垄断,故欧盟的外资政策也是为了保护国内数字企业的市场份额。俄罗斯等国更加注重外商投资的安全性,存在源代码强制披露、交出加密密钥的要求,限制外商对云服务、金融服务、电信增值业务等领域的投资。

总的来看,各国数字贸易政策的主要分歧在于数据监管和网络平台管理方面,政策之间的调和难度较大。在数字产品和服务贸易政策方面,尽管各国的监管方式和力度有所不同,但多数国家均对数字产品和服务贸易自由化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在数字企业本地进入政策方面,各国的差异性较小,共性内容居多,取得协商共识的可能性也较大。

三、全球数字贸易政策的发展趋势

目前,关于数字贸易政策协调的全球性框架尚未形成,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利用区域性贸易协定进行协调和约定。因此,可以基于全球主要国家所签订和正在谈判的贸易协定,对全球数字贸易政策的发展趋势做如下分析和判断。

1. 更加注重对消费者隐私的保护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在第14.7条提出缔约方应认识到保护消费者免受商业欺诈的重要性,同时应当建立消费者保护法。TPP第14.8条鼓励缔约方应当建立和维持保护数字贸易使用者个人信息的法律制度。但是,TPP仅对消费者保护做了倡议性和原则性的规定,而没有明确具体的实施方案和侵权惩罚措施,《美墨加贸易协定》(The United States Mexico Canada Agreement, USMCA)对此进行了完善。USMCA第19.8条第3款指出“个人信息保护”中的主要原则包括限制收集、选择、数据质量、目的规范、使用限制、安全保障、透明度、个人参与和责任。在其他双边贸易协定中,也有很多加强消费者隐私保护的内容。例如,《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和《中国-韩国自由贸易协定》均要求各方应尽可能地为使用电子商务的消费者提供保护,并纳入了电子认证和电子签名要求。如《欧盟-韩国自由贸易协定》(2012年)第7.43

条要求缔约方遵守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承诺，应当采取保护隐私的相关措施，尤其在个人数据传输方面。《美日数字贸易协定》（2019年）允许使用电子身份验证和电子签名来进行数字交易，同时保护消费者和企业的机密信息，并确保将可执行的消费者保护应用于数字市场。

除了强调加强消费者安全保护之外，各类贸易协定中均出现对国际标准化、普适性保护规则的诉求。TPP第14.8条鼓励缔约方建立相关机制来协调不同国家之间的制度差异性，以促进机制间的协调性。USMCA第19.8条要求，各缔约方在建立保护电子商务用户的个人信息的法律框架时，应考虑有关国际机构的原则和准则，例如《APEC隐私框架》和《经合组织关于保护隐私和跨境个人数据流量指南的理事会建议书》（2013年）。

2. 更多提倡有条件的跨境数据自由流动

从最新签订的贸易协定来看，大部分国家基本已经就推进跨境数据自由流动达成共识，自由化的程度不断提高，同时也规定了数据必须在商业必要和安全可靠的条件下才能跨境自由传输。《美国-韩国自由贸易协定》（2007年）第15.8条首次提出了跨境数据自由流动，以软性约束的条款要求缔约国应“尽量避免对跨境数据流动施加不必要的阻碍”。TPP第14.11条规定，缔约方应当允许为满足商业活动而开展的以电子方式进行的跨境信息传输，包括个人信息。同时包含了允许缔约方规定自己的监管要求，不阻止缔约方为实现合理公共政策目标而采取的不符措施。这一模糊的例外规定使得TPP框架下“数据跨境自由流动”条款的实际影响力大打折扣。USMCA第19.11条直接删除了TPP第14.11条第1款的监管需求例外规定，第19.8条第3款强调了缔约方需确保任何限制“跨境个人信息流动”的措施只是为了保护个人信息且必要的，并与所提出的风险成比例。USMCA强化了“跨境数据自由流动”的约束力和执行力。《欧盟-韩国自由贸易协定》第7.43条规定，缔约方应当在保护个人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前提下，通过合理措施保护个人数据传输。

多数国家提倡跨境数据流动的分类监管，例如限制金融部门的数据跨境传输，只有美国极力主张无部门例外的数据流动。TPP第11章附件中规定，允许另一缔约方的金融机构为了实现正常业务而进行信息传输，但是不禁止缔约方要求外国金融企业的数据必须源自本地设置的服务器，这意味着金融数据的跨境流动仍存在一定限制。USMCA的第17.18条明确要求各缔约方不应要求金融服务者必须在该缔约方辖区内使用或定位计算设施，不得阻止另一缔约方服务者以电子或其他方式将包括个人信息在内的信息转入和转出该缔约方境内。从当前的数字贸易规则谈判情况来看，美国与其他经济体之间存在较大分歧，欧盟、澳大利亚等提议需考虑个人隐私安全、文化例外等情况，主张有限制的自由移动；美国则坚持将跨境数据流动位于个人隐私保护之上，明确指出本地化规制应当让位于跨境数据流动。

3. 更多限制使用强制本地化和源代码披露的措施

TPP第14.13条强调协议缔约方不得强制性执行计算设施本地化要求，既不能要求企业在本地成立数据中心，也不可强制其使用本地的数据设施等当地化的数据保护主义方式，来为企业的最佳选择和发展提供保障和基础。但是，TPP也包含了监管例外和公共安全例外。而USMCA则剔除了“监管例外”和“公共安全例外”条款，强化了消除本地化要求的承诺。

此外，知识产权保护范畴也会增大。TPP规定任何缔约方均不得要求转让或访问另一方的人所拥有的软件的源代码，作为在该国销售产品的条件。但是，该条仅限于“大众市场软件或含有该软件的产品，不包括关键基础设施所使用的软件”（第14.17条第2款）。USMCA第19.16条则直接剔除了该限制条件，包括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基础设施软件也被纳入到“源代码非强制本地化”的范畴中。此外，USMCA还将“算法”“密钥”和“商业秘密”新增至“开放禁令”列表。USMCA也明确了加密保护的概念，禁止缔约方在对方“知识产权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将获得加密密钥作为向外国技术开放国内市场的前提。

4. 推崇更加自由的网络访问和使用权

过去部分国家往往对外来网络内容和技术进行筛选,限制国外服务商提供的新闻、广播等媒体内容的传播,即文化例外和视听例外。近年来,各类贸易协定逐渐推行自由开放的网络访问环境,减少对网络供应商服务内容的限制。

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协定在网络内容和技术的选择自由方面,表现最为激进。《和《美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2004年)承诺抛弃文化例外,同意对其视听服务部门做出具体承诺,同时按照美国关于视听服务的要求,同意停止使用现行的用于视听服务的歧视性法规。《美国-韩国自由贸易协定》第15.7条要求,在不被缔约方法律禁止的前提下,消费者拥有自主选择并使用数字产品及服务的权利,允许其自由地将设备接入缔约国的互联网。

区域贸易协定中,TPP电子商务章节第8条规定了接入并使用互联网进行电子商务的原则条款,要求缔约方应当认识到消费者拥有接入并使用互联网进行电子商务的能力所带来的利益。TPP电信服务章节中,确保各缔约方同意其国内的电信规则一般不存在特定技术的歧视性。

欧盟自加入WTO后,长期坚持文化例外、视听例外的立场,但是其态度逐渐发生转变。《欧盟-加勒比海地区自由贸易协定》(2008年)将文化合作纳入视听合作,在有限的情况下,允许非欧盟公司的文化包括视听产业与欧盟公司享有相同的待遇。在欧盟与加拿大之间的《综合性经济贸易协议》(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CETA, 2016年)中,欧盟在文化部门开始采用负面清单形式做出承诺。然而,欧盟在文化视听内容自由化上的态度仍较为模糊,其所做承诺都比较笼统,缺乏实质性的自由化条款。实际上,欧盟在其他章节,如“补贴”“投资”“跨境服务”等纳入了限制市场准入的相关条款,弥补了文化开放的限制政策。

5. 界定更加清晰的ISP中介责任

互联网中介责任要求中介商对侵权承担监督和处理责任,这一要求往往会造成中介商难以明确其责任界限。故最新的贸易协定中对ISP的责任进行明确,并加大ISP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责任。

TPP知识产权章节要求缔约方应为互联网服务商提供版权“安全港”,在认定非知识产权侵权责任时要区别对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与信息内容提供者。但是,TPP对安全港并无检测义务。

USMCA采用了更严格的ISP“安全港”条款,同时也增加了互联网提供商的义务。一方面,USMCA第20.88条增加了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限制条款,规定双方应当认识到促进继续发展作为中介商的合法在线服务的重要性,并以符合《TRIPS协议》第41条的方式强制执行程序,允许权利人有效和迅速地采取行动,各方应建立或维护与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在线服务相关的“安全港”。第19章数字贸易章中,USMCA首次引入“交互式计算机服务条款”,旨在将互联网中介的免责范围扩展至非知识产权领域,明确豁免了网络平台提供者在内容提供者涉及人权以及隐私等非知识产权侵权中承担连带责任(第19.17条第2款)。另一方面,USMCA第20.88条第6款要求提供商在其能够控制该活动且无直接经济利益的情况下,终止侵权者账号的重复使用。这一规定扩充了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义务范围,进一步压缩了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责任豁免范围,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提供商负担。

6. 推行更自由的数字产品和服务贸易

电子产品和服务贸易自由化趋势不断加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求禁止对电子传输产品征收关税,二是扩大产品和服务的贸易自由化范围。一方面,电子传输免关税方面,美国一直奉行电子产品零关税的宗旨。《美国-约旦自由贸易协定》(2000年)第7.1条要求,缔约方应努力避免违背在电子传输方面征收零关税的现行措施。《美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第14.3条规定了电子传输免

关税，但可在不考虑电子内容价值的前提下对载体征税。《美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2004年）第16.3条规定，电子传输以及载体永久免关税。《美国-韩国自由贸易协定》第15.3条要求，缔约方不可对来自另一缔约方的数字产品及其提供者实施歧视性待遇。其他国家中，《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和《中国-韩国自由贸易协定》也规定不对电子交易征收关税。但是，这些条款否定了音像广播类内容在非歧视性待遇上的适用性，具有产品和服务自由化范围的局限性。另一方面，自由化数字产品和服务的范围逐渐扩大，突破了视听例外、文化例外。TPP在第14.4条要求，缔约国遵守“数字产品的非歧视待遇”，要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但是保留了例外条款，增加了“广播产品”的例外条款。而USMCA则剔除了“广播产品”的例外条款，将“国民待遇”的适用范围扩展到广播服务及广播服务提供者。但是，这与其他国家和经济体（尤其是欧盟）在隐私保护以及监管上的诉求相冲突。

此外，数字贸易政策的未来演变，除了需要关注世界主要国家的数字贸易政策，也需要关注WTO数字贸易领域的相关谈判。从2015年至2018年底，WTO成员共提交了40多份数字贸易的相关提案。2019年1月，76个WTO成员签署了有关电子商务的联合声明，正式启动电子商务贸易议题的谈判。从数字贸易政策国际多边协调的角度来看，削减数字贸易壁垒将是WTO谈判的核心问题，具体包括数字贸易规定和制度发展，促进数字贸易自由化、数字贸易便利化和数字贸易透明化等。这需要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共同参与，能否在谈判议题和内容上找到各国之间的平衡点，尤其是实现主要数字贸易大国的合作和规则引领，将对WTO的谈判成果起到关键作用。

四、结论与建议

总的来看，目前各国数字贸易政策的主要分歧在于数据监管和网络平台管理方面政策之间的调和难度较大。基于全球主要国家所签订和正在谈判的贸易协定，可以判断未来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将会更加注重对消费者隐私的保护，更多提倡有条件的跨境数据自由流动，更多限制使用强制本地化和源代码披露的措施，推崇更加自由的网络访问和使用权，界定更加清晰的ISP中介责任，推行更深层次的数字产品和服务贸易自由。未来数字贸易规则必将朝着更加自由、安全、标准的方向发展，中国应当以提高数字经济与贸易竞争力为核心，建设数字贸易大国，同时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提升在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中的话语权。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数字贸易政策比较严格，与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等国的相似度较高，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其他发达经济体存在较大分歧。然而，未来数字贸易自由化已是大势所趋，中国在国际数字贸易规则谈判中将面临重大挑战，具体包括缺少完备的网络信息安全检测技术以及完整的信息管理配套法案、知识产权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信息科技类企业的对外投资面临技术安全问题等。中国应当在做好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前提下，秉承“求同存异”的态度努力在国际谈判中提出并推行“中式模板”。具体而言，中国应在未来全球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博弈中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引入数字产品和服务贸易自由化条款并施行分类监管。中国应当引入关于数字产品和服务的贸易自由化条款，建立对数字产品和服务的分类管理，根据产品和服务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进行筛选，明确哪些类别的产品和服务可以适用于数字贸易的章节，哪些需要单独管理，例如可以将在线咨询、教育服务等数字服务纳入数字贸易章节进行统一管理，将金融、电信等关键行业单独设列其他章节。从而在保障本国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分步骤有节奏地推动数字产品和服务贸易的自由化。

第二，进一步削减跨境数据流动壁垒。从全球数字贸易发展趋势以及各国数字贸易政策发展动态来看，为数据跨国流动提供更加自由化的环境将成为大势所趋。因此，中国需要在确保国民经济安全的前提下，为数据流动提供更为自由的环境，具体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对跨境数据信息实行分类监管；建立跨境数据信息的境内备份，在满足司法机关等部门的调查需求的条件下，不再设置其他额外的数据传输限制；与贸易协定方建立共同的跨境数据审核及监管部门，在保证尊重各国数据主权的前提下，授予缔约方对境内主体数据的无限访问权。

第三，转变计算机本地化的监管模式，推动建立国际统一的隐私保护条例。笼统地规定计算机本地化要求会增加信息保护的溢出成本，不利于网络开放性和自由化。中国应放松对计算机服务设备的本地化要求，将对企业信息管理的要求纳入许可证的批准条件，要求经营主体必须配合中国政府和司法机构的调查工作，对于特定的审查和执法行动或司法程序，应当及时、有效地提供相关信息。此外，中国还推动建立更大范围的统一的隐私保护条例，对信息的使用目的、收集限制、使用限制、安全保障、透明度等具体内容进行细化。由于各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中国也可以在数字贸易国际合作中提出相应倡议，即在满足非歧视性和合理性的条件下允许不同国家根据本国实际需求设立特殊的监管要求。

第四，推动建立数字技术支持与合作的国际机构。在推行数字贸易及数据自由化的过程中，一些国家受制于本国数字技术水平，无法及时有效地防范网络犯罪、隐私泄露等安全隐患。然而，在数字贸易和数字经济日益发展的背景下，任何国家的任何漏洞都可能对全球数字安全带来挑战。因此，中国可以在全球多边和区域多边层面，推动建立数字技术支持与合作的国际机构，为相对落后的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对未来或者现存的技术困境或技术安全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依托该合作平台，各国也可以及时沟通国内出现的网络安全问题，共同识别和减少网络恶意代码的国际传播，及时处理网络安全事件。

2020 诺贝尔经济学奖： 大疫之世的半副药方

来源：财新网(2020-10-13)

作者：程实(经济学博士，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钱智俊(工银国际资深经济学家)

“答案啊我的朋友，它在这风中飘扬。”在新冠疫情百年量级的冲击之下，全球经济亦深染沉疴。传统的全球经贸体系碎裂，传统的经济治理工具失效，现实世界亟需理论灯塔指引新航道。值此大疫之世，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拿出了半副药方。10月12日，经济学家 Paul R. Milgrom 和 Robert B. Wilson 凭借对拍卖理论的贡献摘得诺奖桂冠。他们的学术成果表明，通过微观激励机制的设计，能够更有效地推动宏观经济的变革；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经济学有望对社会发展做出更丰富的贡献。虽然这半副药方难以直接根治全球经济的伤痛，但是沿循两位学者的智慧启迪，更多的良药有望从时代与实践涌现。我们认为，面向经济新动能的数字经济学，优化社会和国际公共品供给的公共经济学，以及积极吸纳创新实践的“弹性经济学”，或将贡献出更多的经济“抗疫药方”。在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中获得优势的经济体，料将在全球格局的新一轮重塑中抢占先机。

当前世界不仅深陷于新冠之疫，亦沉疴于经济之“疫”。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又一次与全球经济一起，站在了历史分水岭之上。根据 WHO 最新测算，全球新冠感染规模预计约 7.6 亿人。这将是超越 1918 年“西班牙大流感”的百年量级大瘟疫。在此冲击之下，全球经济亦深染重疾，其深层根基在三个层次遭到全面动摇。从发展模式来看，全球疫情的长期延续进一步削弱资源、人口、技术等要素的跨境流动，打乱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由此，“要素投入×生产效率=稳定增长”的传统发展范式被瓦解，全球经济已经进入“大萧条”以来的最严重衰退。从组织体系来看，全球疫情对社会民生造成非对称冲击，弱势群体遭到更为严重而长久的损失。由此，发达国家自上一轮全球化以来持续扩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割裂进一步加剧，造成了内部民粹主义、外部保护主义的双重涨潮，昔日全球化的领导者变为“退群者”，传统的全球经贸体系面临颠覆和重塑。从治理方式来看，面对这

一轮经济重疾，传统的政策工具效力不足。尽管发达国家普遍采用了史上罕见的超宽松刺激，但是经济依然难有起色，反而形成“宽松依赖症”，政策力度稍有边际减退，经济数据和金融市场便应声回落。上述种种病症表明，旧药方难治新疾病，值此大疫之世，全球经济的现实世界亟需理论灯塔指引新航道。这也是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格外牵动人心的时代之因。

面对大疫之世，诺贝尔经济学奖拿出半副药方。作为经济学世界的航标，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针对日益失稳的全球经济，不断强化对现实世界发展模式的关注。例如，2018年诺奖花落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2019年诺奖被颁给反贫困研究。2020年，值此大疫之世，经济学家Paul R. Milgrom和Robert B. Wilson凭借对拍卖理论的贡献，击败众多发展经济学的名宿，摘得诺奖桂冠。这一结果粗看超出大众预期，但结合时代背景，则展示出两大思想启示。

其一，以微观机制撬动宏观变革。面对宏大的经济发展问题，如果说前几年的诺奖获奖者都是“从大处着手”的话，那么今年的两位获奖者则选择从“从小处着手”，通过巧妙构建拍卖定价的“小机制”，对买方、卖方和政府形成同向的微观激励，从而推动多方合作，共同解决公共事业建设、产业发展等“大问题”。面向全球疫情时代，经济结构性改革，尤其是公共品供给的优化，不仅需要高瞻远瞩的蓝图，同样需要扎实精细的微观机制，以打破“定价难、激励难、变革难”的负向循环，从小处拉动大变革。

其二，打造实践与理论良性互动。不同于许多深居象牙塔的学院派经济学家，两位获奖者是身体力行的实践派，将自身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进行了深度结合，从而实现了理论不断发展。特别是Paul R. Milgrom曾主持了美国联邦电信委员会的电信运营执照等众多著名拍卖项目的规划设计，并将拍卖机制从“信息对称”的理论束缚下解放出来，应用到“信息不对称”的现实世界，从而取得重大成功。面向全球疫情时代，随着众多传统经济理论和工具的失效，经济理论界亦亟待与实务界紧密合作，从实践中探索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范式。

总体而言，两位获奖者的学术探索表明，为了实现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效率与公平的最优兼顾，机制设计的细节非常重要。当今世界，新冠疫情反复，全球经济萎靡，保护主义盛行。从变局中开新局，需要注重细节、尊重现实、激励兼容的机制创新，进而为国际秩序重建、疫情防控与经济恢复创造条件。2020年诺奖，比较微观，可能没有直接提供解决当下问题的学术指引，但依旧提供了寻找长期出路的智慧启迪。

另一半药方，藏于时代与实践之中，料将决定全球格局分化。从更全面的视角来看，诺贝尔经济学奖本质是对经典理论的回溯性评价，因此其思想启示是也仅是药方的半副，另一半药方仍需要从时代和实践中寻找答案。沿循两位获奖者的智慧启迪，我们认为，未来三方面的经济学发展料将贡献更多的“良药”。

其一，数字经济学。在百年量级的疫情冲击之下，人类社会也迎来了数字经济崛起的百年机遇。一方面，经济社会的数字化升级正在激活增长新动能；另一方面，基于数字经济的新一轮全球化有望重新缔造全球经贸体系，重燃全球同步复苏的引擎。伴随着当前数字经济实践的突飞猛进，相应的理论创新有望展现勃发的生命力和重大的指导意义。

其二，公共经济学。全球疫情时代有别于传统的经济金融危机。对于经济体内部，疫情防治、民生保障等公共品能否有效供给，根本决定了经济金融的复苏节奏。对于国际社会，疫苗药品、国际规则、基础设施、科技外溢等国际公共品的生产和分配，料将深刻影响全球经济走向。

其三，“弹性经济学”。既然百年大疫已经使诸多传统理论框架和治理工具黯然失色，那么不如由此卸下僵化的历史包袱，构建更为开放、灵活、有弹性的理论和工具体系。特别是需要摒弃学派、地域与文化成见，回归以实践为准绳，积极吸纳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疫情治理有效区域的探索成果。

展望长远未来，虽然另一半药方的具体内容仍有不确定性，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在相关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中获得优势的经济体，将大概率在全球新格局中抢占先机。

美财政刺激谈判搁浅对经济与大选的影响

来源：财新网(2020-10-08)

作者：高占军(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中信证券原董事总经理。经济学博士，金融学博士后)

忘记了是谁不久前说过这样一句话：历史上，有时十年里都没有太多的新闻，而如今仿佛一周间发生了十年的事——揣测很多人对此都有同感罢，不留心赶上了这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而大概其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总有那么多的戏剧性和巧合会随时出现。

这不，刚刚就来了一例：10月6日下午，就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罕见直闯财政政策禁区、发出希望国会推出更大规模刺激计划的最强烈呼吁几小时后（相关链接：《美联储主席破例直闯财政政策禁区》），特朗普便发推要求白宫小组中止与民主党就新一轮财政刺激计划进行的谈判，表示将在其当选总统之后再重启。

这两件事前后脚发生，也许纯属巧合：特朗普的推特没提鲍威尔，大概率上他根本就没注意到鲍威尔当天讲了话也未可知。但这就是所谓的“戏剧性”。谈判在这个时点被取消，非但会让鲍威尔颇感无奈，更是惊呆了参与和关注谈判的相关各方，并触发股票市场大幅下跌。

有必要略微交代一下上述财政谈判的背景。

为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众议院在5月份通过了一个3.5万亿美元的财政支出议案，等待与参议院谈判，但后者迟迟未动。两个月后，一方面是7月份以来疫情进一步失控导致经济重启受阻，另一方面是3、4月份为应对疫情冲击所推出的多项纾困措施陆续到期，亟需有新的延续和补充，迫于压力，参议院才于7月27日公布了只有1万亿美元的对应方案。从7月下旬到8月初，参、众两院加上白宫三方为达成新一轮财政纾困协议进行了紧锣密鼓的谈判，但谈判难有突破性进展，陷入僵局。8月8日，特朗普放弃谈判，以签署行政令方式强行推出了单方面的纾困计划，但规模有限，且难以实施和持续。（参见笔者8月初撰写的评论《2.5万亿美元博弈》）

9月下旬，三方谈判重启。但差距过大：众议院的规模为3.5万亿美元，白宫为1.5万亿美元，而参议院只有6500亿美元。为缩小差距，众议院将规模由3.5万亿美元降至2.2万亿美元，白宫将规模提升至1.6万亿美元，希望双方达成一致后，再与参议院进一步谈判，随着差距缩小，人们对谈判成功的预期也在增加，虽然仍有很大不确定性。

以上是背景。

也就是在此关键时刻，出现了前文所述10月6日上午鲍威尔的讲话和下午特朗普的推特这戏剧性的一幕。

为何如此？特朗普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要求中止谈判？诸多疑问一时间引发热议。据笔者观察，他的逻辑有可能是如下一个或多个的综合：

逻辑一：就算是白宫与众议院达成一致，双方认可的支出规模也会在1.6万亿美元至2.2万亿美元之间，这么大的金额，根本无法获得参议院的同意。反正大选前也达不成协议，索性退出。

逻辑二：就算是三方谈判成功，因实施的程序复杂，在大选前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也无法将资金投放下去，对于总统大选的帮助有限。

逻辑三：特朗普希望参议院领袖将精力集中到对最高法院大法官任命的确认程序上，尽快举行辩论和全院投票，以在大选前由其完成正式任命。

不同人往往有迥异的思维逻辑，对其在决策之前究竟怎样考虑，只能猜测却无法确认。但对于某一决策的影响，却可以做冷静客观的分析。那么，特朗普在此时叫停谈判，影响几何呢？

显然，有如下几点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第一，影响经济复苏。最近经济数据显示复苏速度放缓，经济学家多将其归为缺乏额外的财政支持。很多公司宣布新的裁员计划。更多永久性失业。家庭收入开始下降。消费支出增速也放缓。正如鲍威尔在 10 月 6 日的讲话中所说，美国经济前景高度不确定，需要警惕两大风险，而财政支出谈判失败，使上述风险有所加大。

第二，再无缓冲。如果说 8 月初特朗普退出谈判，还可使用行政令做缓冲，那么此次则再无类似手段。就在 10 月 6 日下午发推叫停谈判后，也许反思后感觉不对，当夜特朗普又开始呼吁国会尽快通过几个单独的财政援助计划，包括支持航空业、小企业以及为居民发放现金。但这很难了，因为民主党的原则之一是要求一次性通过一揽子大规模的方案，不同意零打碎敲。果然，10 月 7 日，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再次明确表明这一点，说共和党已经“错失了机会”。

第三，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对共和党大选有负面影响。承担财政刺激计划谈判搁浅的责任，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选情。此前民主党曾备受压力，经常被指责阻挠财政援助措施的通过，也着实受了不少委屈，但经常有口难辩。此次特朗普公开发推叫停谈判，再没可能将失败归于民主党。

笔者观察，这无论对于总统大选还是对共和党人竞选议员席位，都会有直接影响：一方面促使大选的天平向拜登方向进一步倾斜，而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明年民主党人极有可能夺回参议院的控制权。

新冠疫情中的金融市场：交易与情绪的博弈

来源：FT 中文网(于 2020-10-13)

作者：周浩(德国商业银行亚洲高级经济学家)

伴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金融市场也经历了疫情的数轮冲击。尽管新增病例数仍在以几何级数增长，但从金融市场的表现来看，新冠疫情的最大冲击似乎已经成为过去时。然而，回顾这一次前所未有的公共健康危机对于金融市场的带来的冲击，以及金融市场对于未知风险的反应，却有着现实以及未来的意义。

很多投资人都对一句巴菲特的名言趋之若鹜：“在别人恐慌时贪婪，在别人贪婪时恐慌。”然而，投资者对于这句话的真正理解却往往在时过境迁之后，对于新冠疫情的冲击更是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这样的一种“滞后”和“恍然大悟”。同时，如何真正地“自己”和“别人”区分开，可能远不如想象中容易。

疫情的冲击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最大冲击波来自于武汉封城，多数人对于这样一次灾难的感触是微妙的。尽管市场表现出惊恐，但更多表现出对中国政府处理疫情的担忧。当武汉遭遇封城后，多数投资者的第一反应是抛空中国相关概念的资产，然而从事后的反应来看，如果

在中国新年前后看空中国（这几乎是一种无悬念的“膝跳反应”），那么几乎是踩在了危机的尾巴上。从中国股票市场的反应来看，尽管在三月份仍然有一次“二次探底”，但总体而言这只是反映出市场对于危机的自我循环式的加深反应（尤其是在全球疫情蔓延的状况下），事实上并没有改变金融市场整体反弹的大趋势。

与此同时，美股的表现也仍然反映出类似的情境。伴随着疫情在北美大陆的不断扩大，更多人开始认识到疫情的长期性和全球性，金融市场也表现出了对于未来经济的深深担忧。在这样的背景下，美股在3月份出现了崩塌式的下跌，在这样的下跌面前，几乎没有分析师能够给予市场仍然慰藉，几乎所有的市场分析都转向了更加悲观甚至极度悲观。

然而，这个时候，市场也许忘记了那句来自巴菲特的忠告。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各种看似不可能中，美股市场开始绝地反扑，其反弹的力度和速度几乎可以与疫情的蔓延速度相提并论。

分析一下从2月到8月（美股创下新高）的市场心路历程，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几个看似简单却无法自我摆脱的情绪：第一，当疫情开始爆发时，恐慌占据了市场的一切，而此时市场却无力鉴别和阻止恐慌。事实上，对于疫情如何演变，连专业且权威的公共卫生专家也无法给出让人信服的答案，这时候金融市场出现难以抑制的恐惧，并非难以理解。这也证明了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真实差距，事后我们固然可以分析出市场在某个时点上出现了各种“过于”的情绪，但当一种情绪笼罩时，任何一个所谓的“理性”声音都可能被认为是“肤浅”且“盲目”的。

第二，当市场出现反弹时，怀疑又成为了另一个情绪的主角，虽然这样的怀疑几乎无法被证实或者证伪，但怀疑却成为植根于多数人心中的一个魔鬼。相信即使是被迫持有股票的人，心中也多少充满着疑虑，但因为各种客观因素却不能主动表达出自己的情绪。而正是在这样的怀疑情绪中，市场反而不断创出高点，这背后的原因更值得推敲。

从市场的角度来看，有两种力量会让市场出现持续的反弹，一种是空翻多，即此前的做空力量在现实中不得不选择向市场投降，换句话说，这是头寸决定的，因为每个投资在此的个人或者机构都有现实的“按市值计算”的损失或者收益，这导致了任何一个头寸都难以长期地“不止盈”或者“不止损”，而一旦这些情境出现，市场就会出现看似无厘头的持续上升或者下跌。在头寸的力量之外，另一个因素是资金，这背后又存在两种力量，第一来自于宽松货币政策，大量的资金被投放在市场中，这是一个宏观面的因素，追逐资产成为资金的唯一选择；另一种力量则是相对的，这些资金来自于各种市场的跟随着，比如说ETF资金会因为股票市场的反弹而出现更多的资金流入，而黄金的价格上涨可能会带来白银市场的资金流入。

无论如何，市场的各种情绪的反馈和累积，最终会成为推动市场上升或者下跌的力量，而持续的下跌之后出现的不间断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市场存在显著的羊群效应和从众心理，坦率而言，这与疫情并没有太大的关联。新冠疫情以来的市场反应，在很大程度上表明投资者几乎无法准确及时鉴别自身的风险，而最终会把这个决定权交给自己身处的这个市场，此时自己也就跟“别人”成为一体。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外界信息的处理存在很大的无序和随机性。但最后，真正决定市场走向的仍然是情绪，只是多数人置身于情绪之中，无力也无法判断情绪的转折点，进而来判断市场的转折点。

一旦市场被自身的情绪所左右和操控，非预期因素的影响就显得十分重要，因为一个新的变量很容易推翻市场此前已经自洽的逻辑和平衡。新冠疫情这样一个本不被市场所预期的因素，就成为了这样的一个搅局者，其带来的影响和冲击短促而迅猛，但与此同时，情绪的快速逆转也表明各种新的外力因素（比如说疫苗研发和各种纾困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快速对冲之前的负面冲击。

然而，从更加宏观的系统和心理角度来看，新冠疫情事实上对很多行业和个人带来了长期的甚至是不可弥合的影响，这样的影响似乎从表面上无法被识别和鉴别，然而却可能造成非常巨大且长期的

实质经济和金融市场影响。比如说，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之后，家庭对于“团聚”和“重聚”的概念变得更加清晰和敏感，公司对于“地域”的界定会变得更加具体和具象，但因为这类影响的体现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逐步显现，其对于经济和市场的影响也将缓慢并逐步固化。

回顾新冠疫情以来的市场交易行为，我们可以很好地描绘出市场心理状态的变化，在这个从山谷到山顶的过山车中，多数人可以发现自己情绪的弱点，也会更清晰地理解为什么市场会出现反情绪式的交易行为。而当市场回归到疫情前的绝对水平附近后，情绪的过山车交易大致已经结束，基本面交易则会再度成为市场需要自洽的主题——而新的逻辑的寻找和共识达成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从这个角度来说，市场大概率会逐步陷入沉寂和蛰伏。

IMF：新冠疫情将对生活水平造成“持久损害”

来源：FT 中文网(2020-10-14)

作者：克里斯·贾尔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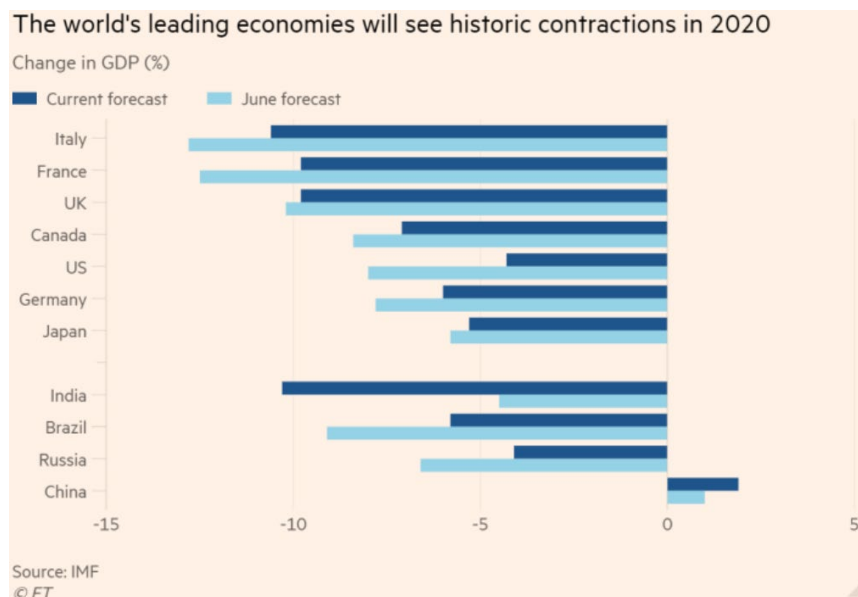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警告称，新型冠状病毒危机将对世界各地人民的生活水平造成“持久损害”，针对富人和公司的税收可能不得不提高，以应对这种经济损害。

该组织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发布的首份中期预测显示，这场大流行病将以造成失业和破产的形式，给全球经济留下显著伤痕，经济中某些行业在整体上将难以生存。

IMF 每年发布两次《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周二发布的最新《展望》称，这种损害将持续存在，因为从苦苦挣扎的行业（比如旅游）向发展中的行业（比如数字技术）调整，将难免是缓慢的，而且对于很多人将是痛苦的。

在发布报告时，该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斯(Gita Gopinath)表示，摆脱新冠危机的复苏期将是“漫长、不平衡和不确定的”。

IMF 表示，适应旅行和通勤减少、破产增多这种现实的需要，将会导致“显著的产出损失”，即便在疫情缓解之后也是如此；而严重依赖旅游和大宗商品的国家很可能陷入“特别困难的境地”。



该组织称，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为负数，这将是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以来最糟糕的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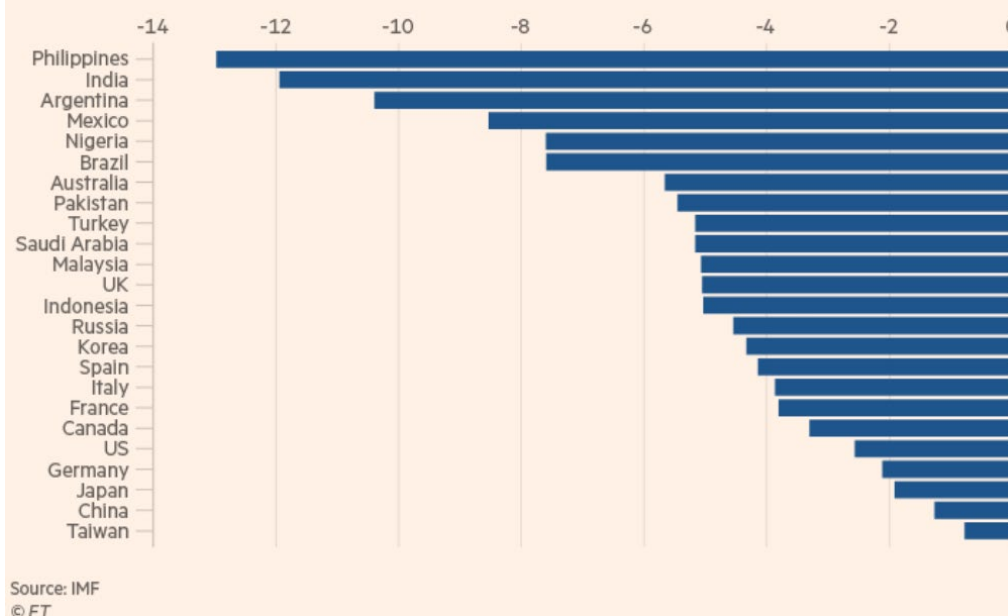
这一悲观展望是在 IMF 已经上调今年经济增长预测之后出炉的。上调预测反映这样一个事实，即第二季度的经济衰退程度比人们担心的要轻一些，而且随着各国放松封锁措施，它们的复苏速度加快。

IMF 现在预计，2020 年全球经济将萎缩 4.4%，比 6 月所估计的小 0.8 个百分点。

该组织预计，只要疫情在明年得到控制，2021 年全球经济将反弹 5.2%，这比 6 月的预测低 0.2 个百分点。

Long-term economic scars from coronavirus

Percentage-point decline in growth forecast between 2019 and 2025



但是到明年底，发达经济体的规模很可能比今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前 IMF 所预测的小 4.7%，而新兴经济体将比今年初的预测小 8.1%。

2021 年以后经济将继续反弹，但该组织警告称，增速将保持相对较弱，使产出低于疫情爆发前所预

期的水平。长期而言，发达经济体受到的打击将相当于国民收入的 3.5%，而新兴经济体的这个数字为 5.5%。

“持续的产出损失意味着，与疫情爆发之前所预期的相比，生活水平将遭受重大挫折，”戈皮纳特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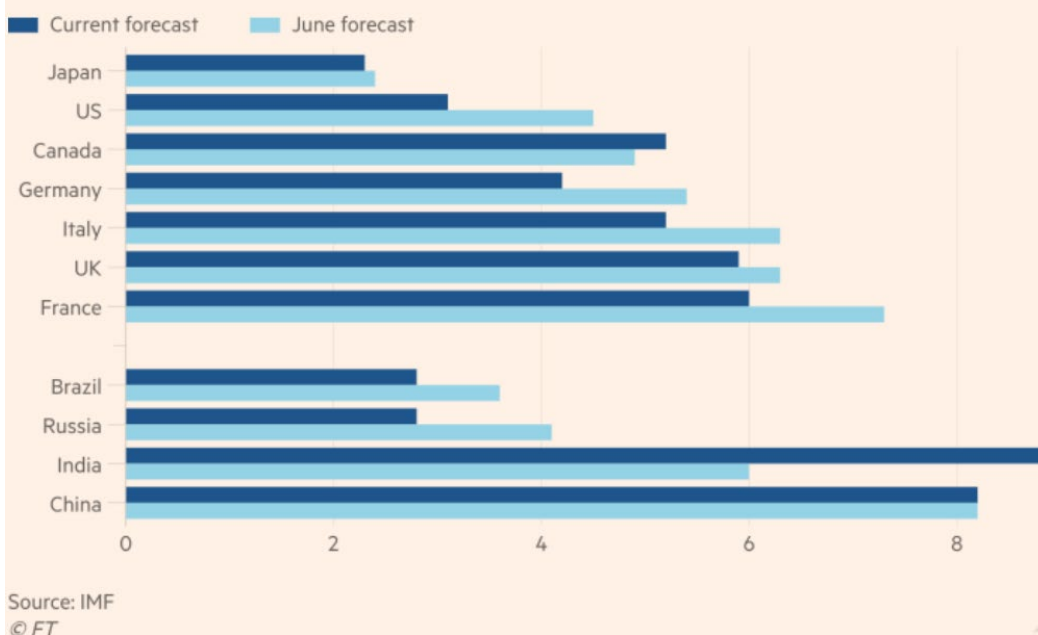
“不仅是极端贫困的发生率将出现逾 20 年来首次上升，而且不平等程度还将加剧。”

女性和技能较低的劳工很可能是受影响最严重的人群。

IMF 表示，由于经济规模将缩小，因此从中期来看，税收收

The IMF still expects a growth rebound in 2021

Change in GDP (%)



入不足以偿还公共债务的风险将会增加——尤其是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因为这些经济体无法以发达经济体能够拿到的那种低利率在金融市场上借款。

戈皮纳斯表示，在未来多年里，各国政府可能需要加大对较富裕人群征税，并确保企业不能逃避公司税。

“尽管在危机期间出台新的财税措施将是困难的，但政府可能需要考虑对较富裕个人和受危机影响相对较小的人群提高累进税率——包括提高针对较高收入阶层、高端房地产、资本利得和财富的税率，”报告称。

但从短期来看，IMF 表示，有能力借款的国家应该尽可能多地借款，以保护其人民免受健康危机的影响，并限制经济萎缩程度。

在可能的情况下，各国应该在这一步之后，才开始着手开展一些艰巨的工作，比如撤销紧急支持，以及鼓励人们进入较少受保持社交距离规定影响的行业。

国内财经

经济内外循环形成的历史、现状和政策转向

来源： FT 中文网 (2020-09-28)

作者： 马晓野 (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瑞士 SGS 公司中国区副总裁、前中国驻 WTO 观察员)

最近经济圈和学术圈的热搜词是扩大内循环。在中南海最近召开的经济专家座谈会上，中央也就这一问题与与会者开展讨论。对国际经济环境重大变化进行思考时，人们的第一反应是直觉性的反应，而直觉来自于过往的经验。经济直觉很重要，但是对这种重大的外部情况变化，我们除了 1949 年的经验之外，自经济体制改革以降我们还没有可以利用的成型经验。与苏联交恶则是在两个同类型计划经济体之间的事情，这与当前的情况借鉴意义不大。一个涉及社会经济形态较大变化的政策，如果能够伴随着有益的讨论，会有助于政策目标的实现。舆论圈里有些讨论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而执行层针对实施政策的讨论则很有必要。通过讨论可以帮助我们弥补经验直觉的不足，有利于在政策调整中做到趋利避害。

大致区分一下，落实扩大内循环的政治决定有两个不同的路径：1，通过调整令人生畏的，牵连较广的社会经济利益安排，通过建立新的社会契约，结构性地提升内循环经济消费方的可支付能力；2，直接对现有的分隔内外循环的政策措施进行调整。第一种情况需要对经济社会改革的联动影响和负面冲击效果多做思考。第二种情况需要时时清醒自己在做什么，想清楚历史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结构性的释放经济潜力和具体的调整内外循环分立的政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向，一旦做出了选择，会生发出大相径庭的政策效果。重点还是要防止调整的结果错误地导向了“自循环”的泥沼中。

政治是讲意愿和立场，学术要讲状态，讲因果，讲规律，而具体政策讨论要更实在一些，讲的是利益调整的取舍。政治决策的理想目标与客观现实之间存在差距这一点也不奇怪，否则就没有所谓政治远见之类的说法了。对于一项政治决定的成功落实，少不了依据经济理论进行推断，以及依据历史的政策过程和经验进行思考。区分上述不同的讨论，适当划分讨论界限是有益的。对涉及取舍和利益

调整的实施政策问题，有必要通过研究还原历史场景，溯源政策演进的过程，厘清政策手段的现实效果，这样才会对下一步的扩大内循环政策调整会有一定的帮助。

对大部分没有政策过程经验的学者来说，进入这样的思考有些困难。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绘就的宏大的经济发展图景，令人眼花缭乱。对于改革成功的政治总结大家都是耳熟能详。但是对于具体的实施政策许多人还是不甚了了。比方说，国内外经济学家都在探讨：中国经济取得了持续高速的发展，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做对了。可各方面推出的答案并不曾统一，而且林林总总的说法中鲜有从具体实施政策过程推演的令人信服的解释。在这方面经济学家似有认知短板。溯源就是从图画的底色开始去理解政策演进的过程，看清不同层次政策技巧和局限。而本文局限于通过回顾历史中看清政策演进的脉络，如能帮助大家分辨孩子和洗澡水，也许在新的政策调整时可以有所借鉴。

本文拟通过“记录—回放”方式介绍内外循环形成的过程及相关的政策手段，让关心这场讨论的各方对经济理论和国际经济循环的实施政策建立联想。本文后面也多少讨论一下更高阶的问题，但重点还是谈造成内外循环格局的实施政策，以期各方能对未来的政策调整有所心得。

中国经济循环的情况是，内外循环在初期的设计是要相互隔绝，继而由外资的介入开始了两个循环外循环部分向内循环经济部分逐渐切入、共享国内市场的融合阶段。重要的事实是两个循环基本上是分立的，而铸就这一状况的政策法规历经调整目前依然有效。

必不可少的历史回溯

再谈经济内循环，恍如隔世。历史上中国经济经循环经历过由内向外的过程。始于80年代的经济循环内外转向的基本理论，和社会政策环境值得花些时间回顾。这可以为我们进行有效的讨论提供事实基础。回顾基础理论，理清政策的延展，观察到达一定结点的政策偏好的变化，方能就政策主张、效果、手段进行有效的线性思考，因为经济本身的发展就不是跳跃性的。

始于八十年代的历史画卷是逐步展开的。“开放”的实施政策有先有后，有时互相促进，在一定阶段互为条件，也有时互为掣肘。政策过程并不像事后粗线条总结的那样是三箭齐发：沿海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利用劳动力优势加入国际大循环，云云。而且，政策导入的过程差异造成的中国产业特点正是我们下一步加大内循环需要重点面对的事实基础。一些作者已经陆续发表过的历史溯源，按此思路添加一些事实与观点，对后来未经历过这一政策转变过程的经济研究人员，政策实践相关人员，企业家会有些帮助。

一、初始状况

计划经济下的经济计划是以产品的物理量作为管理目标。统计体系是MPS物资生产统计，产值只是一个统计上的对应指标。用一句话简单概括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框架下中国国际经济贸易理论是：通过对外贸易“互通有无、调剂余缺”。而这个工具性的“调剂余缺”是针对国内经济循环不能自行解决的具体产品逐年相机处置的。长期的外贸计划重点关心的是出口换汇的计划任务以及配套的银行贷款规模。

国际大循环理论的突破性贡献在于，让政策思路摆脱了原计划经济“调剂余缺”的实物量的局限，从经济生产要素的角度理解和思考经济发展。有人说这个国际大循环不是什么重要的理论发明。经济学家的这个说法也许是对的，但是经济发展的事实证明，把重要的基础理论导入中国经济政策制定中，这的确是功效不可没。

中国在改革初期的基本经济情况是：缺少资金（那时候还不许说资本，因为资本有剥削的嫌疑），缺少机器设备和技术，这使得一些重要的自然资源无法转换成制造业的要素投入。那时中国不短缺而且过剩的生产要素就是劳动力。在这一背景下，年轻经济学家王健根据这样实实在在的比较优势，提

出了“两头在外”的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政策理论，这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但也受到了高层的重视。这个理论能够在后来成为政策调整的理论基础，是因为它在经济改革还没有上路的情况下，抓住了经济理论的基本要素条件中可以利用的部分，使习惯计划经济专注于实物指标管理方式的经济管理者，通过辅助经济要素转向国际市场，使中国明显的比较优势得到了发挥。

那时候美国的劳动工资是中国工人的一百倍。中国劳动力价格比较优势十分明显。这么大的差值足以支付中国低素质劳动力的培训成本，管理欠效率的成本，远距离运输的成本，供应链低效的附加成本，以及全员聘用外方管理人员来华管理、运营企业的成本。

评论：

改革开放这四十年，我们出台了许多政策促进出口贸易。其中劳动力要素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就像古语讲的“纲举目张”的纲。其他政策也重要，有的政策还需要反复更新内容，比较而言大多都只相当于渔网的“目”，其长期作用以及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远不能与“经济增长要素”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功用大。这是理论上解释经济对外开放政策的重点词，而不是“利用剩余劳动力”这样肤浅的说词。

二、为什么要“两头在外”？

后来人在谈到当时的国际大循环理论时，经常会忽略了在当时引起争议较多的“两头在外”。这里讲的“两头”是指原材料供应和产品市场在中国之外。而当时对此提出疑虑的是部分政府经济管理部门，除了担心产品是否能被国际市场所接纳之外，还担心原材料、零部件对国内类似产品行业的冲击，担心会“一头在外”。

从国际国内统一的经济观察视角，将两个经济循环体系过程的要素进行政策衔接，便利企业将内外经济要素进行跨境组合，“两头在外”是基于中国当时的经济社会政策现实提出的正确思路，两头在外的实施政策就得关照到政策冲突的方方面面。初期的两头在外政策设计，要求外循环部分冲原材料到成品，到工厂设立管理运营都隔绝于内循环经济部分。

当时中国的现实是：有生产单位但是没有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企业，也就没有关于企业设立和管理的任何成型法律；除了大集体、乡镇企业外，当时还不能设立私人企业，也就不可能有外资企业存在的空间；生产原材料供应都在计划管理系统当中分配；没有计划外的资金渠道，没有外汇兑换渠道；在生产和销售方面没有任何有意义的竞争；政府对物价实行管控。如要将中国劳动力要素与国外的原材料供给和市场需求进行跨境组合，必须通过对上述情况做出适当改变才能使政策落地。“两头在外”运营的外资企业主体，在当时只能是外资企业。

当时较多关注政治经济问题的学术界则因为邓小平提出的“不争论”戒条而对剥削问题可以暂时不去纠缠。按经典的国际经济理论分析中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很少会有异议。这才使得政策部门可以别无旁顾地去想办法落实这一“两头在外”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设想。但是，政府需要同时特别小心处理好保护国内工业这一政策边界。

王建是当时国家计委下属的研究人员，他的位置提供了恰到好处的政策视野，使他能把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打通。因为环境所限，他人很难做出王建这样的政策贡献。其他只接触经济数字，无法深入经济政策过程却努力提政策建议的学界朋友会感到较难进入状态。

三、中国经济要素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有一个相当复杂的“摸石头过河”的政策试探过程

“春天”那首歌的歌词中讲的一个老人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改革开放就一路向前，那是高度艺术抽象的美声唱法，强调的是政治意愿起了关键作用，这其中缺省了复杂的政策过程。随着改革开放一路走来的政策实践人员普遍同意说，中国制造业今日的成功是不可复制的，这说法的依据是：政策

调整过程有“不可化简的复杂”的特性。

中国制造业经济能够达到现在的内外循环状态，是依从了比较优势理论，先确定了总的“两头在加入国际大循环”的目标，再经过十分复杂的、一系列的内外政策手段调试才有了目前的成功。这其中实施政策调整的内容比较广泛。经过了很多的政策创新和政策试错，才使得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政治决策得以逐步在制造业行业稳步推行并产生了突出的效果。

现在强调加大内循环，也是审时度势做出的新的政治决定。执行、落实政治决策，与学术上依据目前产业状态来分析政策转向的影响，进行理论验证和对接，是并行不悖的必做工作。现阶段对过往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政策调试历程做梳理，有助于“加大内循环”的政策转向的设计，有助于避免政策目标与政策手段的脱节，也有助于防止政策超调。

当初能够做出这样的“开放”举措，很重要的社会经济原因是城市就业问题和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国内根本无法解决。只有打破经济自循环，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痛点、弱点才能够反转，（把那么多的嘴变成那么多双手）才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国际比较优势，经济增长才有了新的出路。

理想中的新的政策目标本身，不会通过政策宣示自我实现。政策目标需通过以下具体的实施政策手段，即政策过程来推进。了解了这些政策历史过程，可更好的了解目前中国经济循环问题的现状。让我们通过下面的这几点回顾了解一下复杂的政策创新过程：

1.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在没有本国企业法和公司法的真空状态下，制定了中外合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等三个外资企业法。另外专门针对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需要，制定了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的管理的法律规定。然后在后续配套的实施条例及细则规定中又对水、电、劳动力指标，进口设备税务，管理人员办公设备，外籍人员留华等都做了变通管理的规定。外汇管制也逐步开了专项口子。中国有比较优势的经济要素加入国际大循环由此开始起步。

2. 出于保护国内民族工业的需要，一开始利用国内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是严格守住两头在外的原则界限。原材料、生产用设备都在保税状态下虚拟进口，产出的产品完全不进入国内市场，经加工后径行监管出口，甚至边角余料也不得随意内销。2020 年度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是一篇关于全球化背景下多年国际价值链生产的专论。报告观测到，在全世界各国都是以进料加工为主参与国际价值链生产，而中国却是以来料加工为主。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我们长期执行内外循环隔绝，保护国内内循环部分经济不受、或少受外来冲击的管理政策的实施效果。

以经济要素对接国际市场为目标，以三来一补业务为先驱，外资企业的法律存在作为落地形式，一旦在公有制计划经济的水泥板上出现了政策空间，市场机制的作用就开始萌发，然后市场的作用开始推动政策快速演进。

一些旨在补偿当初外资（主要是三来一补企业）得不到计划内优惠，外资企业不得不在供给稀缺的不完全市场上另行协商行解决生产需要，政府在初期给予外资企业补偿性的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在后来国内市场逐步发育，计划逐步退出的形势下，反而成了外企的“超国民待遇”。渐次，政府又对外资税收政策作了相应的调整。客观地看，这一类逐步退出优惠的“逆向”外资政策调整的对价，是对外资更多地放开了国内市场。政策调整的效果之一是将两个循环的边界进一步模糊了。国内外分立循环的市场互相融合部分的“带宽”加大了，让有比较优势的中国生产要素进入国际经济循环带来的新情况是，在市场的推动下，经济政策需要调整的方面越来越多，这也给更深层次的制度性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

3. 我们的外向经济部分规模大，对外经济占 GDP 的比重在峰值年份达到了 67%。其中封闭运行的外循环部分占比很大。时至今日，中国经济的内外两个循环分开的痕迹仍然明显，区隔两个循环的政策手段仍在有效实施中。还不能说中国经济已经基本解决了内外循环的共生和融合问题。

通过回顾历史，突出提到这一点是想提醒，设计新的促进经济内循环的实政策时，应该防止累及国际循环，这方面的政策需要稳定并持续改善。对这一点中央的政策表达是比较明确的，关键是在性政策手段的设计上应予较好的落实。

四、经济外循环设计专项政策与国内经济改革

经济改革是渐进的，还要在保证内循环部分的主体尽可能地少受外部经济干扰和冲击的情况下容纳外循环经济部分。

为了保护国内既有的国有企业能在此前提下逐步脱离计划管理，而同时计划性质的以最终产品数量为考核指标的产业政策仍需通过国企来落实，寄予厚望的大规模的对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仍要推进，在这样的约束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就需要“两头在外”的外向型循环的管理政策尽可能地隔绝国内外循环。要兼顾两个看似不相容的政策目标——保护国内产业和以比较竞争优势的经济要素与世界市场对接，隔离运行就是唯一的政策选项。

在具体实施开放政策的初期，先是建立了一套适应“三来一补”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海关保税监管制度。这实际上是建立了一套“境内区（海关关税区域）外”的单独关税管理区域。这也可以说是主权管辖内的经济国中之国，这和经济特区还不一样。当然，这也是国外其他主权国家有益管理经验的移植，也是国际通行作法。

当这一体系与设立特区政策走到一起了之后，参与国际大循环就在特区内很快成了气候。（早期的特区发展先成为计划资金、关税优惠、与配额的特区，这都与外向型的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关系不大，为此曾受到不少的质疑。中国在WTO谈判时介绍，特区不是政府推动出口的补贴特区时，就举出了相关统计数据，谈判对手为此大跌眼镜。）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一开始就有“条条”和“块块”两个路径。“条条”管理进出口及海关制度，这是中央的事权。地方属“块块”对经济发展机会与中央大一统的政策有较深入的观察体验。扩大外循环政策更重要的区域突破来自广东和福建。广东积极创造条件，成功地游说中央政府允许省内“三来一补”开放方式落地，全境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分析比较所见，一旦外向型的加工贸易管理在全省落地，广东、福建两省与经济特区的管理政策差别就很小了。再后来，中央又允许“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步经济特区的后尘，可以沿用“三来一补”政策参与国际经济循环。

经济增长和就业需求的压力使得地方政府以很大的热情推动外循环部分的经济扩大。招商引资甚至补贴措施都是为了扩大经济要素与国际经济循环的对接。从制度设定方面去理解，这些特殊地区政策的关键在于这些地方享有通过监管下的加工贸易便利，将经济增长要素的比较优势参与了国际经济大循环。

从产业发展角度看，“三来一补”这项直接连接生产要素与较高质量的国际价值链生产对接的政策手段，为制造业产业赶上国际制造业发展的步伐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条件。内陆省份，中西部地区纷纷要求设立内陆海关，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加工制造业得以向沿海以外地区扩散。在这过程中，国务院口岸办公室根据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产业需求和贸易扩展情况，循序扩大政策基础设施，在境内所有有条件的地区，逐步批准境内关外隔离管理便利以支持更大的区域参与国际经济循环。中国经济扩大与国际市场接轨，外循环经济中的制造业有了地理梯次的演进，中西部也可以继沿海之后依照比较优势参加到国际经济循环中去。

五、初期的单向“开放”与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带宽”扩容

如前所述，中国经济参与国际经济循环一开始只是单向开放。为了保护内循环经济部分的制造业产业，国内外两个经济循环分立可以最大程度屏蔽开放循环对经济内循环市场的影响。后来，由于国

内资本稀缺现象持续，吸引外资政策在原三来一补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大。外循环独木桥进行了渐进式的加宽。下面就是“带宽扩容”的政策变化过程：

随着进口许可证的大幅减少，保税加工监管也出现了进一步的松动。一部份非最终产品形态的外资保税加工产品，在审慎政策协调基础上经补税后，也有可能在“以产顶进”的安排下进入下游生产企业的采购渠道。实施政策的延展在制造业封闭的外循环政策安排上打开了缝隙，这时才把在“境内关外”渐渐成长起来的原料、紧缺的关键零部件有控制地纳入了国内市场的经济循环过程中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要。

这些渐进的中间政策变化又反过来提示了制造业外资，可以通过变身正式进入——从事三来一补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可以选择：直接以内资待遇的子公司方式平行设立一个具有同等能力的内资企业，以避免“违反三来一补”规定的政策风险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

当跨国公司认真考虑建构更合理的国际价值生产链的时候，我们的整个外向经济循环体系和管理政策也予以配合，从提供便利的角度适时进行了跟进。此时的外循环思路已经不再拘泥于当初的政策构想起点。

对外循环政策的带宽扩容，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国务院一个秘书长牵头的国务院特区办，在四个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切块”政策出尽后，工作内容就包纳了协调开放区域（特区）内的外向经济循环带宽扩容。

实事求是地说，紧跟国际技术和管理水平的外循环公司享有较高的美誉度，更容易在中国市场扩展制造能力来满足不断增长的国内市场需求。主要参与内循环的公司，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外循环一开始要困难一些。多年的实践表明，外资企业在带动外循环经济的同时，通过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外溢以及“适度”的竞争，促进了内资企业的能力提升。这原本是与严格隔离内外循环的预期政策效果不太相容的，但是又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可喜的现象，也是开放促进企业进步的非政策设计的意外收获。

中国制造产业整体上在与国际市场接轨的锻炼中得到了提升，原来遵循“两头在外”原则设计的一整套政策也随着国内吸引外资政策的进一步变化而变化。“外来”的制造能力以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技术和制造水平加入了国内市场的循环，这类双循环运营企业左右逢源，成为了市场上的强者。

六、双重政策目标是偏重于经济内循环部分的稳定，政策效果有得有失

内循环经济的制造业产业布局有赖于严格的两个循环相隔离的政策环境。改革之初，百废待兴，而中央文件描述说国民经济是在崩溃的边缘。国家还是得按照计划经济的思路动用财政力量重新对国有制造业进行再投资。一项重大的制造业产业政策是用了两期两个三年的时间，在全行业搞了六千多项企业技术改造。为了保证大部分经重新投资的国有企业能够在内循环经济中顺利运转，高强度的全面保护是必须的政策保障。在关税方面，中国八十年代初恢复了征收关税，此后关税水平在一路提高。中国的纺织服装业本应是最有成本竞争力的，在内循环“需要”的压力下，这一类别的平均关税反倒成为了全税则目录中最高的：纺织服装全部类别产品的进口关税平均高达70%。机电类产品更是受到重点保护，例如电子产品中的台式计算机机的关税高达100%。除关税外，管理进口的各种行政审批要求有三十三种。进口所用的外汇基本都要经过计划安排。具体政策落实在处理内外循环关系时，要考虑同时支持两个循环的双重政策目标。而中国的情况复杂，有时不能搞一刀切，还需要一事一议。政策实践中发展出来的折衷的处理方式是：一类情况一个适用政策，国务院为此先后发布了80多个对高关税进行特殊减免的文件，针对内循环经济的情况进行了动态管理。批评者现在看来这事儿近乎荒唐，但实事求是回顾这个过程就可以看出，非此不可能兼顾内外经济循环隔离的政策目标。

当时的内外循环分立安排是实行双重政策目标的需要：对外部开放自己优势的经济要素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对内部市场实行严格的产业保护，外循环部分不得越雷池半步（有兴趣的人可以去调查一

下,严刑重法下历年因违反“三来一补”加工贸易规定而被求刑罚的人数和海关相关的罚没收入数字)。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刚经过“技改”方式再投资的内循环经济部分的国有制造业企业又遇到了困难。内循环经济经过九十年代技改,清理三角债等多种尝试,其间还不得不进行了一轮大规模的所有制“改制”,内循环经济进步不小,困难还是不少。九十年代中期,内循环制造业的设备利用率在50%以下。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统计反映有的年份GDP产出有一半是卖不掉的库存,经济循环阻滞万分严重。内循环不畅原因有各方面的,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经过改革,国内销售市场端在原材料双轨制的条件下开放了,而原来的计划经济传下来的,以最终产品数量为指标的产业规划,与不断变动的市场实际需求不可能相符。在争夺政府投资资源的利益驱动下,制造业产业政策的固有问题,国企经营机制的改革方面滞后这些深层次的改革难题,都使得内循环经济有些举步维艰,而奇特的是这又反过来成了内循环部分不宜加大改革力度的理由。

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作为国家经济骨干的国有企业的兴衰,是政府必须始终小心处理的问题。改革初期,为了重建制造业产业基础,政府在屏蔽国际竞争压力情况下对国企进行了以技术改造为重点的大规模重新投资。对外开放的步骤必须对此加以配合,甚至要以此来设定开放的领域和开放的力度。而屏蔽国外同类产品的竞争的手段是大幅提高关税,实行许可证进行行政审批,以确保两个循环尽量少的在国内市场相遇。长此以往,又使得内外两个经济循环的融合难以形成。更不用说本来通过两个循环融合,提升内循环部分的市场竞争力,就没在对外开放政策的考虑之中。隔离政策依照惯性执行下来基本未变,内循环经济部分因为屏蔽了强的外来竞争因素,运转基本满意。负面效应是,在国内市场受高关税、许可证和进口配额保护的环境下,企业提高效益的动力不足。因为国际竞争压力很大一部分被外循环政策缓冲掉了,在国内市场受高关税、许可证和进口配额保护的环境下,企业提升绩效的动力不足,国企运营机制的改革基本上是在照猫画虎内核不变,内循环经济部分的企业在舒适的弱竞争环境下乐于得过且过,运营效益提高不快。

毋庸讳言,内外分离的两个经济循环运行有历史功绩但是弊病也很大。有这样的分割竞争政策就有不公平市场的后果,国企改革也因而可以在弱市场竞争条件下一再后推。经济整体运营效率的提升一定被拖累。

有一个现象是,吸引外资政策撬动了内外经济循环非直接竞争产品类别的隔离政策边界,间接促进了内循环企业保护性政策的退出。随着吸引外资政策的再放开,审批权限的下放,地方政府在吸引外资上的竞争等促变因素起作用,相当一部分外资企业能够迂回到高关税和行政审批构筑的进口贸易壁垒后面。国内市场渐进式的感到外资企业进入带来的市场竞争压力。

外资进入国内市场是在行政审批控制下逐步实现的。内循环经济部分感受的竞争压力也是逐步增强的。外资企业“后门攻入”内循环市场,在高度保护的市场上逐步增加了竞争力度。这对中国加入WTO承担大幅度消减进口壁垒的开放义务,进行了很重要的预热准备。

中国与前苏东国家的经济改革不一样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渐进”。中国两个相互隔绝的经济循环的部分融合,是随着逐步开放外资的政策节奏,经过了一个徐徐的渐进过程。各项对外开放政策之间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给内循环经济部分带来了提升竞争能力的必要压力。这也是政策设计未曾料想的意外收获。

七、实施效果与内外循环状况

半封闭的外向型循环经济部分曾经是中国制造业对标国际,进行技术提升的重要接轨场景,是大规模培育产业集群的基地,是向内循环部分外溢生产技术、管理经验等驱动进步因素的重要来源。这些常年积淀下来的、与国际直接接轨的制造业产业集群,比较产业政策支持下的内循环为主的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要强一些。这些产业集群是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突出亮点。

中国的开放政策（外资加外向型经济循环）成绩斐然。据统计，全世界制造业各个领域排名前十的巨头基本都在中国市场有投资。这些投资项目基本上都是同行业企业中的“排头兵”。中国市场已经成为全球汽车工业竞相推出新车型的首发市场。在中国对外关系变得全面紧张以前，欧盟在华商会和其他外国商会已经接近形成一个共识“在中国，为中国”（In China, for China）。从产品研发开始就关心中国市场，不再把中国作为全球布局中的三、四线市场。欧盟等重要的中国经济伙伴，多年来积极与中国政府进行投资谈判，希望成为中国内循环经济的一个不受歧视的部分未果。

外循环经济，特别是“三来一补加工贸易”对物流效率的苛刻要求与管理政策在中国充分磨合并得到了满意的成效之后，中国逐渐发展成了全球运营跨国公司在亚洲的物流运营区域中心。物流中心与制造业产业集群的协同配合，使中国成了全球价值链生产和供应链运营中的重要一环。这也是中美贸易纠纷中双方投鼠忌器，难以割舍的共同利益所在。

八、从制造业产业角度观察当下经济内外双循环的一些特点

上面的历史溯源做了一些有选择地描述，目的是在斑斓的色彩中还原外向经济循环政策的底色。对改革开放政策偏于政治总结的文献，许多省略了政策过程而过于简单化。通过在具体政策过程的溯源，多理解一些各阶段的政策与经济背景，根据当时的政策目标客观的估量一下得失，这对下一阶段政策调整向内循环倾斜有一定参考借鉴意义。

在国内外形势剧烈变动的时候，一方面要积极应对，另一方面还要防止政策的大开大合。毕竟，推石头上山难，蹚石头下山会有一发不可收之势。加大内循环政策落地也应该要审时度势，逐步到位。

我们四十年的对外开放有三个方面：发挥劳动力的国际比较优势，通过政策设计将无法跨国流动的劳动要素，随产品参与国际经济循环；有控制的逐步开放制造业外资企业政策；在一波相对长期稳定的国际市场环境中，合理地利用国际原材料供应和市场容量作为我制造业产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在这三个方面，终端产品管理、产业政策、优惠与限制政策有交叉，有隔绝，也有互相渗透和促进。

下一步的调整对这些开放政策内容会做什么调整？政策调整的方向是什么？这是引起全社会关注的大事情。

中央明确提出对外开放是坚定不移地。这个政策目标陈述还要结合拟出台的政策手段来观察才能判别对具体行业的影响。业界关注的是，应对来自美国等外部的政策冲击会使政府做那些调整。有关政策会减缓还是放大外部冲击？如果放大冲击，会不会分阶段逐步到位。终究，分阶段、逐步到位是渐进式改革的成功经验。外资政策演变与内外双循环

九、中国已经是大国中最大的外向型经济，但是经济循环依然有内外双轨运行分立的特点

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长足的进步。观察家和经济学者都在研究：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定是因为中国有什么事情作对了。不可辩驳的事实表明，中国与贸易相关的工业制造业的高速发展，起到了首屈一指的作用。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对外贸易在整体经济中越来越重要。有关国际比较说明，中国外向经济对增长的重要性超过了“贸易立国”的日本。在贸易重要且占比高的大国经济中，能与中国比肩的只有德国。

2. 内行看海关统计就可以知到，海关进出口统计有一个专门的统计表是加工贸易统计。这个统计数字受贸易专家重视，但被许多产业政策研究者所忽略。根据统计可以看出，政策引导下的加工贸易，常年占中国进出口总量的50%以上，多年来政府强调要提高一般贸易的比例，经过大力调动非加工贸易出口的积极性才使得加工贸易到了50%以下。而在对美国的贸易中，加工贸易曾常年占到70%以上。有的年份直逼90%。也就是说，独立于内循环经济的封闭、半封闭运行的外向经济循环地位特殊。

3. 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制造业外向型经济部分是与国内经济循环隔绝的。后来有了交集，交叉，部分融合等等，但是国内外市场分割的政策设定始终未有根本性的变化。这也是为什么业界专家在中美贸易战中，一直在紧张地观察政策干扰对国际供应链的冲击。半封闭的外向型循环经济部分一直是中国制造业对标国际，企业进行技术提升的重要接轨场景，是培育产业集群的试验基地，它的外溢效应也是中国制造业从管理到专业技术取得长足进步的活的来源，它更是下一阶段全球第四次工业革命价值链的互联基础。

4. 内外两个循环的经济过程看两者之间未完全打通

上面简略提到各种观察都提示我们，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外向型经济部分已经全面超越了当初设定的：通过国际经济循环发挥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释放剩余劳动力的政策目标。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政策，是便利中国制造业超常发展的一项具有导向意义的重要经济政策。

无论从产品内外销的质量，价格档次，到融资便利，物流管理，产业园区的政策，到市场竞争管理等方面来看，参与国际大循环的部分和内循环的部分都有所差别。今天我们面临向内循环转向的时候，理解了分开的经济双循环的经济现实和基本特点，才可以更好的考虑向内循环转向的政策手段以该怎末调整。

十、外部资本作为经济要素参与经济内循环

因为基本定义和非经济意义的模糊观点较多纠缠，不想在外资这个话题上涉猎争议区间。但是在经济内外循环问题上，外资问题又是一个不得不提及的特殊因素。只能单刀直入从要素角度做一描述。

资本是特别重要的经济生产要素。回溯性的宏观投资回报研究显示，改革开放初期一美元的投资可以取得八美元的投资回报。但是此前，中国对作为经济生产基本要素的资本基本上出于政治理念予以排斥，更不要说来自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外来资本了。七十年代计划经济后期开始，随着中国回复在联合国恢复的地位，世界银行不设任何条件地跟随联合国的政治决定回复中国的权力，中国开始接受政府项目的贷款。以此开端，中国开始一步步的对外来资本问题的重新考虑出于政治经济理论的自我设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政治上与世界银行一样，服从联合国的政治决定接纳了完全计划经济性质的中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多边出口信贷管理使得中国将其与当中国七十年代对工业进行现代化更新投资做了对接。当时自我划定的界限是：可以搞一点多世界银行等边金融机构的贷款。出口信贷最适合的目标领域是工业制造业的大型项目对华出口。自此多边金融机构的贷款从政府的基础设施，扩大到了国营企业的工业基础制造业。

中日建交中方放弃战争赔款。投桃报李，日方转而提供大量日元贷款。在中国存在着投资饥渴现象这样的大背景下，日元贷款做了初步试水性的突破。到了1980年，谷牧“利用外资”的谨慎提议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但是在具体的政策设计方面，靴子落地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快。通过政府整体外债的管控，双边安排“利用外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渠道。作为资源开发，进一些设备生产外方需要的能源来抵偿设备款是另一套思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虑让外国商人自行进口生产设备，生产产品自行出口以解决部分国内剩余劳动力出路是第三种思路。

上述回顾说明了领导人开绿灯式的推动十分重要，摸石头过河首先得被允许下河。终究，如何对待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资本，是一个敏感问题。实践引领“非正式”的转变观念，国内也在不知不觉中把“资金”改称为“资本”，逐步减弱了对资本赚取利润的敌视。利用外资也演变成了吸引外资。

依据经济增长原理，资本、劳动、资源、技术和管理技能是根本的生产要素。摆脱具体实施政策得失和利益调整功过的评价，从经济增长和要素，以及经济循环这一角度思考，吸引外资实际上是将

国外的资本要素引入到国内经济内循环中。吸引外资政策过程是一步一步的：仅允许做政府负债；资本以外循环生产设备为载体的特设准入；外循环部分不脱离产品媒介，有控制的向内循环经济延展；超越原外循环准入思维的吸引外资思路，仍然坚持不放开内循环经济与外部资本要素的结合（仍维持较长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仍然用不同的清单对外资进行全覆盖管理）。

评论与思考：尽管中国在吸引外资的统计数量上位居前茅，但是在国际经济要素参与经济内循环方面一直是按行业状况有控制的逐步引进。到目前为止，中国对国际资本这一经济增长要素参与经济内循环仍持谨慎态度，外资开放领域基本上沿袭当初始于“两头在外”的制造业实体。后来的外资审查仍然重点关注内循环实体经济的市场竞争情况，一些领域的管理细化到项目、预计产能。

国内外资本市场隔离是一项长期坚持的政策。对外资市场准入的管控方便了在国际利率上涨或下降的长周期过程中，屏蔽其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影响，可以在施行相关政策时较少受外部资本市场形成的利率基准的制约，保持自己的金融政策和金融体系的稳定。但是，在国际利率进入较长的下降通道时，内循环经济的资本要素成本高于国外，势必抬升了基础的经济成本，进而影响到内循环经济的竞争力。

扩大内循环是否应该脱离原来的吸引外资思路，是否都应该从国际市场要素成本参与国内经济循环角度作新的政策思考，如何在变化了的形势下从新的角度进行利弊评估，这都是在重大经济政策调整时应予研究的问题。

回顾过去三、四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过程，我认为让劳动力要素与国际经济外循环对接，参与国际价值链生产的政策在诸多对外开放政策群中起到了以“纲”带“目”的作用。过去的成功的经验要认真发掘。生产要素的解放不同于边缘改动，在新的经济政策调整的当下，不妨认真研究一下作为经济增长要素的（国际）资本参与国内经济循环是否能再一次起到“举纲”提振经济的作用，制约条件是什么，如何趋利避害。

十一、理解扩大经济内循的必要性，政策方向与制约条件

大国经济内部循环越活跃，抵御外部市场的政策环境变化的能力就越强。根据加强经济内循环的政治决定观察具体政策动向，可以从经济和实施政策两个方面入手。一个思考方向是结构性的释放内循环部分经济的潜力，走的是抓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路子。另一个方向是在目前双循环分立、有一定融合的政策框架基础上，观察政策效果，评估利弊，再行调整。

前者需要在多年改革留下的难点上想出路。这从大的方向上符合中央以推进改革来应对外部条件变化的思路，但是真正推动实在是太难了。这四十年改革与开放互相促进，国内经济体制改革走的是一条通过周边改革创造条件的渐进的路子，留下来的都是改革的难点，换个思路也是事关结构性释放经济活力的重点。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和讨论并不充分。加之事关联动的配套改革涉及面广，需调整的利益错综复杂，在目前的条件下可能难以达成社会共识。另外，从操作层面看与以前不一样的是，这样的改革已经没有摸石头过河的宽松条件了，过河半途中很难歇脚和转向。这对改革的操作能力也是极大的考验。下面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从经济循环角度看，内循环的困难点主要是在提高居民收入方面。十四亿人口中相当一部分人是低收入人群，这部分低收入人口不应计入经济循环研究中的有支付能力的消费群体。根据消费行为研究，三亿多中高收入人群如果再增加收入，也不会对社会消费有较大的贡献。因为他们的消费已经进入平台期，新增的收入大部将用于投资而不是增加消费。从提高收入方面入手拉动经济内循环，必须要现行的社会政策予以配合。如果政府主导提高工薪阶层的收入，能够落到实处的是一些行政事业单位，国企也可能跟进，最终还是难以增加全社会消费能力。

根据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若想改变社会财富初次分配博弈时资本方强势劳工方的弱势的状态，

需要制度化的安排劳资双方就工资问题进行集体协商。这是解决社会财富初次分配难题最有效的手段。中国在市场化改革的初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工资收入增长落后于GDP增长。通过税收进行国民财富的二次分配，只是对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包括国企职工）有直接作用。较低收入的非公企业就业人员在国家通过税收进行二次分配时，反倒是通过个人所得税向下平均了劳动就业群体的消费能力。

从各国的社会实践看，建立有效的社会利益博弈机制以改进国民财富初次分配，是提振社会消费能力的有效方法。中国国情不同其实是讲社会状况，管理方式和治理理念不同于其他国家。提升社会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对于加强经济内循环至关重要，这也兼有对社会治理的难点进行改革的作用。

面对外部经济政策环境变化的压力，通过制度性安排下的经济利益团体间的博弈来快速提升内循环经济的消费端的支付能力，不是一个容易的政策选择。

十二、直接调整内外循环分开政策的难度在于“分清楚洗澡水和孩子”

如果出于求稳，较多考虑维持社会博弈结构不变，暂不考虑收入分配加入社会博弈机制来进行经济结构性的调整的话，就只有在供给侧想办法这个选项了。如果不能做到改变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进而帮助国内经济循环扩大，一时也做不到扩大总人口中有消费能力的人口比例，供给侧能做的贡献大体上是：更新或迭代原有的消费需。而在“制造新的需求”方向上，供给侧的努力必会遇到总需求的制约。

我们要注意的，中国制造业尽管表现很强，国内企业的设备利用率在新冠疫情之前平均达到了70%。这是一个重要的成本相关指标。但是，为世界制造的中国，顶峰时期的平均70%指标与制造业的翘楚的那些国际一流大公司相比还有距离。（对老熟工业国家平均水平50%，60%的横向比较没有意义，因为他们的低水准是受到了外部竞争压力的结果，不在竞争状态）。如果我们应对外部出口受阻采用的促进内循环的部分政策，无意中起到了遏制竞争、诱导设备利用率走低的作用，经济内循环的质量会下降。

周边性政策调整和改革在既有的框架束缚下，早已举步维艰。如果难以从结构上释放活力入手，不得不在内外两个循环的现有政策上进行选取，我们必须十分小心。可供选择的思路应该通过充分论证，避免只按照政治意愿推进，具体政策没有顺应经济规律以及发展逻辑。

专门提出这一点是因为，在调整两个循环的实行政策时，从大的举措方面观察，政府可以做的事情无非是：一，限制进口保护市场以利内循环；二，提供大量补贴，使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长期受到一定保护的內循环企业得以在新设定的有利条件下继续参与市场循环。如果这两方面的政策作用叠加，可能我们的经济会通过加大内循环进入到自循环的状态中。

历史告诉我们，一定时期内两个循环相对分立，内外有别的政策有效地避免了经济政策目标之间的矛盾。当前形势迫使两部分的制造能力开始更多的共享内循环市场，这时的政策选择就会变成：偏向于经济中较强的部分让强者更强？还是用政策来限制强势的外循环部分，以利于较弱的内循环企业多占据国内市场？（国企又占了相当一部分，这使得这一抉择又多了些许政治底色）。

如果形势所迫不得已选择了后者，我们一定要把对吸引外资政策的走向、影响一并估计在内。在客观条件不允许我们做“趋利避害”，只可能作“两弊取其轻”的选择的时候。政策调整的前提是要分清洗澡水和孩子，要尽量避免失误。

历史告诉我们，外资政策在两个循环分立时利用政策缝隙催化着两个循环的融合，对化解两个平行市场冲突方面有过重要的另类贡献。新的政策调整如何处理内外两个循环过程中的“翻墙者”——外资？如何处理外资这个跨墙的梯阶？促进内循环的政策保障工具中“公平竞争政策环境”问题将如

何处理?政策切换过程中,全世界都会沉下心来仔细观察。不应忘记,外资管理政策问题仍然是各国从“市场竞争政策”角度对我诟病较多的重要的谈判议题,也是欧盟二十七国长期对华全面投资谈判的主要诉求。毕竟,对外开放的两大领域:外资和外贸是比较各国经济活力的重要观察点。

如果这是一段历史的结束,在重大的政策转向时刻,经济政策调整的内容会比本文涉及的情况复杂得多。回溯制造业为主的经济开放政策历史中“不可化简的复杂”的政策过程,也许有助于在处理新挑战的时候避免简单化的思维,承前启后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前行。

这是我国“十四五”期间及以后的重要任务

来源: 爱思想网(2020-10-14)

作者: 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人类社会进入到了风险社会时代。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不确定性。2020年年初暴发,至今仍在全球扩散的新冠疫情就证明了整体不确定性在强化,全球经济深度衰退,全球治理陷入混乱,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加剧。这给我们带来了求变、求发展的机遇,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风险。

风险带来的是成本、损害和损失,是对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威胁。降低整体不确定性,防范化解公共风险,为我国的发展构建起可持续的确定性,成为我国“十四五”期间及以后的重要任务。

国家发展可持续的确定性,要靠改革开放的深化来构建

人类的风险意识很早就有,但“风险理性”并未真正发展起来,风险思维不够发达。较之于个体风险理性,集体的公共风险理性尤其滞后,临时应急成为基本的集体行动方式。

其实,每一次危机都是对我们已经构建的确定性的冲击。2008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陷入了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和高负债、高风险、高度不确定性状态,以确定性世界观为基础的现代经济学体系已难以解释现实和指导实践。疫情带来的冲击更是导致全球治理与发展的混乱、衰退。面对不确定性的充满风险的世界,需要新的认识和理论创新,尤其是公共风险理性,已更是不可或缺。

我们从过去的发展经验中悟出一个道理:在一个不确定的风险世界,国家发展的确定性要靠我们不断努力去构建。除了以探索和创新来对冲公共风险,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今年的疫情冲击前所未有的,我国对冲这种公共风险取得巨大成效,靠的就是这种探索和创新精神。

改革开放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不断防范化解公共风险,探索、构建国家发展确定性的过程。我们的法宝是:不断解放思想,努力超越过去构建起来的经验确定性和理论确定性,用公共风险意识不断地去构建新的确定性。

回头看历史,都是确定的;抬头看未来,都是不确定的。过去的成就、经验、理论都只是一种历史的确定性,难以用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只有打破条条框框,才能杀出一条血路。

我国40多年快速发展的确定性就是这样构建起来的。创建经济特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实行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方式、共治共建共享、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等一系列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才使我国实现了持续发展,稳稳地站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只有当我们的思维和意识从不确定性出发时,才能获得我们所需要的集体确定性。相反,若是我们的思考只从确定性出发,思维就会固化,我们得到的就可能是发展的不确定性,甚至面临危机。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也是发展的基本逻辑。

世界历史进程开启了不确定性模式，解构确定性的速度越来越快于构建的速度，全球秩序与发展的动荡会不断摇晃我国这艘巨轮，甚至会引发大的颠簸。我国的发展好比登顶珠峰，已经到了“半山腰”，越是往上走，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就越大，唯有靠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和制度创新，才能确保我国发展的确定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降低发展的成本，关键在于公共风险管理

从整体来观察，国家发展的成本取决于公共风险。公共风险越大，国家发展的成本越高；公共风险越小，国家发展的成本越低。公共风险转化为公共成本或者说宏观成本，成为发展可持续的最大约束。

从现在仍在全球扩散的新冠肺炎疫情来看，它对全球发展的负面影响变得日益严重。世界多数国家由此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全球分工与协作体系被打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不同程度地中断。加上地缘政治的影响，中美关系的恶化，原有的经济金融全球化逆转为风险的全球化。在小小的病毒面前，原有的秩序不堪一击，疫情这种防控难度很大的公共风险转化为巨额成本，成为全球未来发展的严峻挑战。

公共风险之所以会转化为发展的成本，是因为它改变了人们的预期和行为方式，资源配置偏向于预防可能的损害和损失。例如，银行面对风险，必须有拨备；企业面对风险，必须提减值准备；面对感染风险，必须保持距离和环境消毒，诸如此类都是成本。公共风险水平越高，微观主体的成本就会越高，国家发展的成本就越大。这就需要公共风险管理机制来发挥作用，对冲公共风险，以降低国家发展成本。

公共风险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经济社会活动中内生的。规则与秩序提供确定性，可以对冲公共风险，从而降低公共风险水平，降低宏观成本；一旦原有的规则和秩序被打破，无法提供确定性，公共风险水平就会急剧上升。在这种宏观环境下，微观主体的经营成本、交易成本都会扩大，国家发展就会减速甚至陷入停滞。宇宙学家霍金说，世界的本质是不确定性。我们在一定时空条件下构建的确定性都是暂时的，需要通过公共风险管理机制来实现防患于“未然”，避免出现“已然”，也就是不断升级过去构建的确定性，前瞻性地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水平，化解发展成本；否则，等待我们的将是公共危机。

新冠疫情突袭，也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核心科技被人卡脖子，供应链被打断，全球化急转弯都超出原有的经济全球化逻辑，如此等等。这些都成为我国发展中的公共风险，转化为发展的成本，拖累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之所以出乎意料，根源在于理论上没有一个基于公共风险的分析框架，使我们“看不到”风险，也就谈不上建立公共风险管理机制。

公共风险管理机制不是一个外在独立的东西，而是应内嵌于国家战略、规划和制度之中。适时调整国家战略、完善规划、创新制度，是公共风险管理的根本和基础，也是降低发展成本的关键所在。战略过时带来的风险是最大的风险，制度缺陷导致的风险是源头的风险，这些公共风险往往转化为最大的发展成本。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发展，就是防范战略风险的一个战略举措。平常说的制度成本，其实质就是制度缺陷引发公共风险而导致的各种交易成本和社会成本。所以，构建公共风险管理机制，并非要另起炉灶，而是要把风险思维、预防理念作为战略规划制定、各项制度设计的核心思维和理念，渗透到战略、规划和制度当中去，以公共风险为导向，对战略的实施、规划的实行和体制的运行实时监测，防范风险溢出增大发展成本。

这意味着对改革也提出了新要求。深化改革不应仅仅以“已然”的问题为导向，而应更强调以“未然”的风险为导向。预防做扎实了，应急的事情和难题就会大大减少，大的发展危机就能得以避免。可见，全面构建公共风险管理机制实质上内嵌于全面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之中。

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应以不确定性来把握整体和全局，以公共风险为思考问题的基点来谋划未来，避免片面的“工程思维”渗入到对未来发展的规划当中。传统的确定性在消失，国家发展需要不断构建新的确定性，以降低发展的总成本。发展目标的最大约束是公共风险，公共风险的最小化，是发展成本的最小化，也就是发展目标的最大化。在这个意义上，公共风险管理也就是国家发展的成本管理。要避免发展的波折，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公共风险管理在新发展阶段变得越来越重要。

构建公共风险管理机制，应纳入十四五规划当中

实现第二个百年发展目标，“十四五”是关键的五年，构建公共风险管理机制刻不容缓。

一是“风险导向”应优先于“问题导向”。坚持问题导向是非常正确的，但不全面。一般来说，我们面临的问题都是“已然的”、确定性的，解决了“已然”的问题，不等于可以防范风险。而风险是不确定性的，属于“未然”的问题，有产生潜在损害的可能性。防范风险，是要预防问题的产生。要减少问题，必须把防范风险前置，预防优先。这与减少疾病是一个道理。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发展保持可持续的状态。

二是要对发展过程中的公共风险进行沙盘推演，形成具体的防风险预案。2003年非典之后，各领域都制定了相应的应急预案。这是一大进步。应急预案是危机来临时的行动方案，如确定应急响应等级、储备应急物资等等，但不等于风险防范措施。防范风险的目标是避免危机，不是处置危机，两者性质是不同的。只有防范风险，才能减少应急。减少生病比病后治疗更重要。但这个常识往往被忽视。在当前来说，防风险预案比应急预案更重要。

三是防风险要更重视制度性安排和长效机制。从理论上讲，公共风险与制度缺陷是相伴而生的。生产关系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调整的，制度也需要与时俱进。改革是推动制度完善的根本办法，改革滞后，公共风险就会增多。就此而言，唯有加快改革步伐，构建长效机制，才能减少和降低公共风险水平，从而降低发展的成本和阻力。也可以说，当前面临改革和风险赛跑的局面，改革只有跑赢风险，才能赢得我国发展先机。

四是在国家的各项决策中，如出台相关政策、改革方案，都应当加入一道公共风险评估的强制程序。从现实来看，决策产生风险是常见现象，如产生处置风险的风险、部门决策产生“合成谬误”等等。所以，防范公共风险，首先要预防决策风险，避免决策中的风险盲区。在公共风险管理机制中，应规定：凡是没有进行公共风险评估的决策方案，不得发文出台。目前我们在一些重大项目上，已经开始做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但还没有做到对所有的决策进行公共风险评估，应当尽快实现全覆盖。

五是区分公共风险与个体风险，明晰风险责任。防范公共风险是政府的责任，而个体风险则是企业、家庭和个人的责任，两者不可混淆。厘清这两个层次的风险，是构建公共风险管理机制的前提条件。要分清不同主体的风险责任，防止道德风险和风险防范中的相互依赖。一旦出现缺位、越位和错位，公共风险管理就会失效，甚至衍生出更大的风险。

六是连结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通过数字技术为公共风险管理提供支撑。公共风险管理需要加快数字政府建设。实体空间应与虚拟空间相结合，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公共风险思维有机融合起来，运用于公共风险管理全过程，提高公共风险的监测、识别和预警能力。

中国“双循环”的六大支柱

来源：路透中文网(2020-09-30)

作者：程实(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钱智俊(资深经济学家)

“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面对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双循环”料将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框架，在发展方向上指向“国强”与“民富”，在运行形态上指向“行稳”与“致远”。沿循这一战略定位，构建“双循环”的关键在于用好改革开放与制度优势的两大重器，同步打造各司其职、相辅相成的六大支柱。

这六大支柱包括需求升级、供给升级、金融供给侧改革、宏观调控现代化、数字经济发展与国际定位升级，将在“双循环”中依次承担发动机、启动器、加速器、导航器、新赛道与连通器的核心功能。

展望未来，随着六大支柱的确立和巩固，中国经济“双循环”有望畅通运转，平稳发挥化危为机、化变局为新局的战略职能。

第一，发动机：需求升级

在全球大变局之下，内需将取代外需，成为支持中国经济平稳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根据我们测算，在保守情景下，2019-2035年，中国经济的内需潜力有望实现倍增。顺应这一趋势，如何激活和利用好内需潜力，将成为“双循环”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在这一领域，未来“双循环”料将沿着三条主线发力。

其一，稳步推动“两新一重”基建投资，在撬动投资引擎短期反弹的同时，也将通过基础设施的优化，大规模培育消费新场景和新渠道，进而带动消费引擎的长期回暖。

其二，通过优化供求结构和制度变革，激活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升级，尤其是加速消费升级重心向低线城市和农村地区下沉，更加普惠地、更多层次地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其三，加速新型消费需求的成长，将年轻世代的个性化需求转化为丰富的细分市场，将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转化为在线文娱、云服务、新零售等新型消费的扩张空间，不断形成更具活力的消费新增长点。

第二，启动器：供给升级

以消费为主的内需升级并非无本之木，而是需要供给升级予以先导性的支持：一是依靠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缓解消费意愿的不足；二是新供给创造新就业，补上消费能力的短板。供给升级将启动新一轮消费升级，并立足于升级后的内需市场完成下一轮供给升级，由此开启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

基于中国的现实国情，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未来的供给升级料将包括依次传导的两大环节。其一，基础性要素的供给升级。

一方面，对内坚持改革攻坚，加速五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与数据）的市场化配置，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推进国资国企改革，从而全面提高国内要素配置的效率和质量。

另一方面，对外扩大高水平开放，通过“一带一路”和人民币国际化，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和金融合作，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其二，商品服务的供给升级。一方面，抓住全球价值链重塑的契机，将国内价值链拓展为富有深

度的“研发设计（科创头雁）→品牌营销（国货潮牌）→加工制造（隐形冠军）”的完整链条。

另一方面，抓住服务贸易回流的契机，推动传统服务贸易向内生长，满足国内服务消费的新需求；加速新兴服务贸易向外生长，缔结与全球体系的新联系。

第三，加速器：金融供给侧改革

伴随中国经济的“减速增质”，金融周期对经济周期的影响日渐增强；伴随中国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本位，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正在构建长期良性的共荣共生关系。基于此，未来金融供给侧改革若能进一步深化，有望对“双循环”的畅通运行发挥三个层面的加速作用。

其一，利率市场化完成“最后一公里”，叠加融资渠道的多维拓宽，有望引导要素资源向优质的中小企业和新经济企业配置，形成“稳经济+补短板+锻长板”的政策集成效应。

其二，资本市场的稳步发展有望通过“财富效应”，在需求侧助力消费升级，通过“投资效应”，在供给侧推动产业升级，从而进一步打通供需双升级的良性循环。

其三，借助中国金融的高水平开放，中国经济在疫情时代的相对优势将吸引国际资本的长趋势流入，与更加多元的国际伙伴共享双赢机遇。

第四，导航器：宏观调控现代化

在全球大变局之下，国际风险形势日益复杂多变。在高质量发展之中，国内多重政策目标更需精准平衡。与之相匹配，建设“双循环”新格局，必然要求中国宏观调控在“一大一小”两个层面进一步走向现代化，以引导国民经济平稳运行。

从大处来看，以改革攻坚优化政策体系。其中重点包括：在货币政策领域，依托“利率并轨”改革，实现对增长、物价、就业、金融安全等多目标的动态兼顾；在财政政策领域，依托财税体制改革，优化央地财权事权划分，重塑地方政策实施的激励机制与资金支持；在政策协同领域，优化财政、货币、产业政策的搭配组合，降低全球政策的外溢影响，长期保持“以我为主”的政策定力。

从小处来看，以工具创新提升政策效力。通过推出更多结构性、精准性、直达性的政策工具，从事后式、粗放式、逆周期的干预模式，转向前瞻性、精细化、跨周期的调控模式，使政策空间的应用更为高效和可持续。

第五，新赛道：数字经济发展

在全球大变局之下，全球经济在传统领域陷入“存量博弈”的泥淖。开拓经济发展的新赛道，以良性竞争促进共同发展，将是全球经济走出困境的治本之策。在数字经济的新赛道上，中国经济目前已成为全球领航者之一，未来进一步加快自身及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将是“双循环”的应有之义。

具体而言，这一趋势料将体现于三个层面。其一，数字经济产业化。中国数字经济的技术创新提速落地并发展为完整的产业链条，在需求侧创造新的消费场景、消费习惯和消费需求，在供给侧提供数字驱动的商品与服务，并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和“人口素质红利”，打造新维度的供求循环。

其二，传统产业数字化。立足于中国完备的产业链条，通过物联网、5G等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升级，并与高度数字化的居民生活相连接，中国有望引领全球从“大规模生产时代”走向“数字化生产时代”，融合大规模、创新力和精细化的三重生产优势。

其三，经济治理数字化。一方面，以基础设施和政府服务的数字化升级，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适宜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以央行数字货币、数字财政等数字化政策工具，打破传统政策工具的“天花板”，进一步提高经济治理的广度、力度与精度。

第六，连接器：国际定位升级

在全球大变局之下，经济全球化面临长期且全面的退潮风险。基于这一环境，中国经济“双循环”虽然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是并非走向“闭关自守”，而是选择通过向内发力，为高水平开放打开向外空间；通过夯实自身实力以提升国际定位，从而带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进步。

具体而言，这一国际定位升级预计将体现于三个层面。其一，价值链定位升级。基于“双循环”中的供需双升级，中国经济从全球价值链中的“供给”中心升级为“供给-需求”双中心，从全球价值链的中下游升级为中上游。

其二，国际金融定位升级。凭借“内循环”的相对韧性，人民币资产将进一步凸显高成长性、低风险性的双重优势，为全球长线资金提供“压舱石”，人民币的网络效应与回流机制同步完善，配合石油人民币的发展，多渠道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其三，国际治理定位升级。在全球乱局之中，中国将为全球经济金融提供稀缺的“稳定锚”，从全球经贸体系和治理格局的被动接受者，升级为全球经贸体系和治理格局重塑的主动引导者，从根本上规避脱钩风险、改善外部环境、防范外溢冲击。

新闻快讯

2020 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 “拍卖理论”经济学家

来源：FT 中文网(2020-10-13)

作者：德尔菲娜·施特劳斯

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的两名教授——保罗·米格罗姆(Paul Milgrom)和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获得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Nobel Memorial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以表彰他们在拍卖理论和新拍卖形式设计方面的工作。

该奖项的正式名称是“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银行经济学奖”(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评奖委员会表示，他们发展的理论推动开发了新型和复杂的拍卖形式，如今在世界各地被广泛用于各种目的，如拍卖无线电频谱、分配机场起降时段，以及建立排放交易体系。

拍卖结果很重要——对纳税人、对私人部门的买卖双方都是如此——因为它们影响着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电力或政府债券的价格，到移动通信网络覆盖质量，以及垃圾收集工作的顺利进行。

然而，要了解拍卖形式将会如何影响结果是困难的，因为竞标者的行为是战略性的，基于他们自己掌握的信息，以及他们认为其他竞标者知道什么的信息。

评奖委员会称，这两名获奖者的工作“极大地造福于社会”，让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和政府不仅能够最大化财政收入，或以最低价格采购，还能把相关活动委托给最适合管理它们的参与者。

“这是一个极好的选择，”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教授、同一领域的佼佼者保罗·克伦佩勒(Paul Klemperer)表示。他说，威尔逊被视为“实用拍卖设计之父”，鼓励了一代学生，其中包括米格罗姆。

他补充说，米格罗姆虽然以在拍卖领域的研究成果闻名，但即使没有这些成果，他在工业经济学和博弈论等其他领域的贡献也会让他成为一个“极具影响力的人物”。

1937 年出生于内布拉斯加州的威尔逊，发展了一套面向具有共同价值的物品的拍卖理论，共同价值在拍卖前是不确定的，但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例如一枚原始钻石，交易商对可能的转售价值的看法，将决定他们的支付意愿。

他展示了为什么竞标者往往把出价定得低于自己对共同价值的最佳估计：因为他们担心“赢家的诅咒”——即过高估计共同价值，导致出价过高。

1948 年出生于底特律的米格罗姆，提出了一套更为普遍适用的拍卖理论，既考虑共同价值，也考虑随具体竞标者而不同的私人价值。例如一栋房屋具有一定的转售价值，但对某些人来说具有比其他人更高的入住价值。

该理论意味着，如果竞标者被允许在拍卖过程中更多了解彼此的估计价值，卖方将实现更高的价格。

两人最著名的贡献之一是他们在 1994 年共同设计了美国首次向电信运营商拍卖无线电频谱的模式。当时这是一个挑战，因为在所有地区的牌照都分配出去之前，运营商不知道某个地理区域的牌照对他们来说有多大价值。

米格罗姆和威尔逊发明了一种新的拍卖形式，称为“同时多回合竞拍”(Simultaneous Multiple Round Auction, SMRA)，涉及同时拍卖所有地理区域的牌照，从低价起拍，允许多次竞标。此后几十年，这种形式成为许多国家拍卖无线电频谱的标准方法。

米格罗姆还参与开发了更为复杂的“组合价格钟拍卖”(Combinatorial Clock Auction, CCA)形式，允许竞标者对打包的一揽子物品或牌照——这对他们而言可能比其各组成部分之和更有价值——进行竞标。

评奖委员会指出，这两位获奖者的不寻常之处在于，他们既发展了理论，也开发了其研究成果的应用方式。如今，拍卖变得越来越重要，各国政府越来越多地使用它们来分配电力和自然资源等资产。

在得知获奖后与记者们交谈时，威尔逊表示，除了在 eBay 上买过一双滑雪靴以外，他不记得参加过任何拍卖，但是如今拍卖非常普遍，成为互联网搜索引擎上出现的每一则广告的基础。

尽管如此，在去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发展经济学家、以细致的实证研究而非理论突破闻名的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之后，评奖委员会今年的选择标志着该奖回归传统领域。

牛津大学的克伦佩勒表示，拍卖理论对经济学而言是完美的实验室研究课题，就像“果蝇”之于生物学家，因为拍卖的简单结构使其适用于测试和发展关于竞争和博弈论的更普遍理念。

9 月财新中国服务业 PMI 升至 54.8

来源：财新网(2020-10-09)

作者：沈凡

随着国内服务业加速恢复，10 月 9 日公布的 9 月财新中国通用服务业经营活动指数（服务业 PMI）录得 54.8，较 8 月提高 0.8 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此前公布的 9 月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录得 53，较 8 月下降 0.1 个百分点，受此拖累，9 月财新中国综合 PMI 下降 0.6 个百分点至 54.5。

这一走势与统计局 PMI 并不一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9 月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上升 0.9 个百分点至 55.2，综合 PMI 则上升 0.6 个百分点至 55.1。

9 月服务业新订单指数小幅上升，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调查样本显示，市况转强，新项目开发，有助于提振销售。在服务业与制造业订单双双上升的支撑下，综合新订单指数继续提高。

服务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连续三个月处于收缩区间，且降幅较 8 月小幅扩大。部分受访企业反映，疫情继续对出口销售造成冲击。9 月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录得 2017 年 9 月以来最高，带动综合新出口订单指数今年以来首次升入扩张区间。

随着市场回暖，服务业企业连续第二个月增加用工，就业指数连续两个月处于扩张区间，但仅略高于荣枯线。制造业企业结束了连续八个月压缩用工的状态，9 月就业指数升入扩张区间，但增速轻微。综合看，两大行业企业总体用工规模继续扩张。

新订单增加，导致 9 月服务业企业积压工作指数重回扩张区间，但增速轻微。制造业企业积压工作量继续上升，带动综合积压工作量小幅上升。

因用工、运输和原料等费用增加，9 月服务业投入品价格继续上升，企业反映整体成本升幅仅算轻微。制造业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连续四个月处于扩张区间。二者综合，综合投入成本继续上升。

9 月服务业收费价格连续第二个月上升，但部分受访企业表示，为吸引新订单，加价空间有限。制造商继续小幅上调产品售价，幅度低于 8 月。综合产出价格继续上升，但升幅轻微。

9 月服务业企业乐观度在扩张区间小幅提高，与长期均值大致持平。中国服务业企业继续乐观预期未来一年经营活动会有增长。业界普遍认为，疫情一旦结束，全球经济状况将会转强，客户需求会上升。

财新智库高级经济学家王喆表示，目前经济运行仍然处于新冠疫情之后的恢复期，恢复速度还有所加快。疫情后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首次同步改善，但力度不强，就业形势依然不容过分乐观。未来一段时间，海外疫情的反复和美国大选仍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仍面临极大挑战。

IMF 预测： 中国将是主要经济体中今年唯一正增长国家

来源：求是网(2020-10-14)

作者：吴乐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3日公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预测今年世界经济将萎缩4.4%，比今年6月的预测数据上调了0.8个百分点，并预计2021年增长率将反弹至5.2%，比6月份预测低0.2个百分点。

IMF表示，全球经济仍深陷衰退，此次上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率的主要原因是第二季度经济数据好于预期，且有迹象显示第三季度的复苏更为强劲。但这得益于超常规的刺激政策措施，目前各国政府和央行已向家庭和企业提供了约12万亿美元的财政支持，但各国也要防范中期金融风险积聚。

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认为，全球经济正从危机深渊中恢复，所有国家现在都将踏上“漫长的攀行之路”，这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漫长、坎坷而充满不确定，且极易出现倒退。

IMF预测发达经济体今年将衰退5.8%，其中美国经济将衰退4.3%，欧元区经济衰退8.3%，英国经济衰退9.8%。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将衰退3.3%。中国将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保持正增长的国家，预计今年增长为1.9%，明年将达到8.2%。IMF指出，“中国的复苏速度快于预期”，称在4月初大部分地区重新开放后，经济活动正常化的速度快于预期，在强劲的政策支持和出口弹性的支撑下，第二季度GDP出人意料地出现了正增长。

目前，IMF已经向81个国家提供了融资，贷款承诺超过2800亿美元，以帮助他们度过危机。IMF呼吁，各国应建设更具韧性的经济，这是实现强劲、可持续复苏所必需的。IMF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塔表示，为确保经济持续复苏，首先需要加强国际合作结束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公共卫生危机。

各方利好点亮黄金周中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来源：中国网(2020-10-10)

作者：孔德晨

全国零售和餐饮重点监测企业销售额约1.6万亿元；共接待国内游客6.37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4665.6亿元；前7天电影票房近37亿元，为历年黄金周次高水平……国庆中秋长假期间，零售餐饮、国内出游人数、旅行消费规模等多项数据达到今年以来的最高峰。业内人士指出，节假日消费作为推动内需重要的催化剂，正在让中国经济活络起来。

消费热情高涨

“十一”黄金周期间，消费表现亮眼，因疫情“欠下”的消费，国庆加倍“还”上了。

——旅行出游热情高涨。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显示，八天长假期间，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6.37亿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恢复79.0%；实现国内旅游收入4665.6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恢复69.9%。

——促销活动丰富多彩。全国各地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积极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促消费活动，消费需求加快释放，市场人气持续攀升。据商务部监测，10月1日至8日，全国零售和餐饮重点监测企业销售额约1.6万亿元，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十一”黄金周增长4.9%。

——商品消费持续升级。“十一”期间，吃穿用等基本消费需求稳定增长，有机食品、汽车、智能家电、金银珠宝等升级商品销售增幅明显。海南离岛免税购物异常活跃，吸引境外消费回流效果明显。黄金周前七天，海口、三亚、琼海等4家免税店零售额同比增长167%，免税购物人次同比增长64%。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任兴洲表示，这次假期为积累了超过半年的居民消费热情提供了释放空间，既展现了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也反映了中国经济的韧性。“这次消费的增长，依赖于从生产端到流通端、消费端的全方位协同作用，是中国经济复苏的一个综合体现，反映了疫情防控常态化下中国经济恢复发展的强大能力。”

新型消费壮大

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网络购物、直播带货、网上订餐、定制旅游等新型消费在黄金周期间不断蓬勃壮大。

“宅家不想动，旅行不负重”成为消费者过节新“姿势”。饿了么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黄金周前五日，居家外卖消费增长显著，大闸蟹、月饼、鲜花等时令商品以及网红店半成品、生鲜蔬菜等订单量均较去年同期有明显增长，其中仅鲜花订单量同比增长近两倍，大闸蟹销量同比增长近八成。该负责人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无负重出门，在酒店、景区附近点外卖采购洗漱用品、手机充电器以及一些常备药品等必需品。”

各地商家直播带货为消费增添不少亮色。据商务部监测，辽宁餐饮零售企业通过直播线下引流、线上平台带流等方式，网上消费占比超过20%；新疆若羌县果农通过直播带货，日均销售瓜果16万元；湖南麻阳邀请网红主播带货，中秋节当天实现销售额45万元……苏宁易购“十一”消费数据显示，“十一”期间，苏宁直播的订单量同比增长1854%，销售额增长2383%。

过节新玩法不断“解锁”。黄金周期间，大型网络平台密室逃脱、VR游戏、汉服体验等新型消费订单量同比增长58%，看电影、逛展览、观演出、去健身等成为居民休闲度假的热门选择。“十一”前7天，全国电影票房近37亿元，为历年黄金周次高水平。

未来更有动力

假期消费的亮眼表现背后，是多部门和地方促消费政策利好的集中释放。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以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新型消费加快发展的意见》，旨在补齐新型消费短板、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打通痛点难点堵点，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线上线下消费深度融合。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高杲表示，在推动新型消费发展方面，将完善实施机制，夯实制度基础，包括强化财税、金融、用工、用地、社保等方面的支持，鼓励企业运用新业态新模式拓展国际市场。

“今年黄金周的繁荣景象，也意味着未来消费市场仍将持续恢复。”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赵萍说，“随着商品和服务的供给恢复常态，居民收入水平实现正增长，消费信心不断增强，消费也将进入到正常的增长轨道，商品消费将持续增长，服务消费也将快速恢复。”

任兴洲指出，下一步应继续推动经济恢复，以扩大内需、消费升级为核心基础，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并有效激发潜在的内需潜力。要顺应居民消费趋势的变化，提供老百姓真正需要

的商品和服务，使供给和需求的适配性不断提高，推进消费市场潜力加速释放。